

戊戌六章

许章润

山巅出版社

v20200713

目 录

引言	1
这世间，总要有人出来讲理	6
中国在临界点上	12
一、五种表现	13
二、五大后果	25
三、三个问题	30
四、这是为什么?	34
保卫“改革开放”	39
为何必须“保卫改革开放” .	40
新极左	45
中产阶级必须担负政治责任 .	52
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59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65
四项底线	65
八种担忧	73
八项期待	84
过渡时段	92
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	98

一、八大问题、转型四系与双 元革命	100
二、五场战役	105
三、最后一役的复合性质 . .	111
四、重申四个观念	116
五、「该不该」与「能不能」, 必 须交由全民讨论	126

“哪有先生不说话?!”	132
-------------	-----

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137
------------	-----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 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 政治观与文明论	155
---	-----

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 救政治	157
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 路径依赖	166
三、文明小国	176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 存在	186
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 国家理性	193

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

基础 198

践踏斯文 必驱致一邪魅人间 204

出版社的话 211

参考资料 212

版本历史 213

引言

集中六文，成稿于戊戌年间，故称《戊戌六章》。另有两篇，分别撰述于丙申丁酉，均应“天则新年期许论坛”而作，适主题相近，特此附录，一并庋刊。凡此八篇，成一小册，述大心事，做无用功。犹记秋风寒雁，夏雷冬雪，文竟掷笔，思竭体衰，而长街踉跄，无地彷徨矣。

此一主题非他，不外“中国问题”，陈述的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华夏文明大转型。其起因与后果，其指向与愿景，其进程与阶段，其成就与挫折，其实然进路与可欲措置，尤其是它的当下困顿与万众绝望。诸文此前早已陆续刊发，于此设问而追问，在此运思复遐思。海内外广布，千万人传诵，小叩而共鸣，正说明人同此心，人间普世大道虽九曲回肠却不屈昭彰。此番集中公诸同胞，旨在激发思考，凝神聚气，而同心合力于解决“中国问题”，期

期于造就“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公共家邦。舍此大转型，华夏邦国无法存身于现代世界体系，遑论生民康泰，人文日新；无此公共家邦，则祖国不过是党国极权的殖民地，芸芸亿众都是遭受掳勒的待典人质；违逆此一人间大道，奔趋于红色帝国，只会是死路一条。过往百年，之所以一波三折，而终究贞下起元，就在于顺应世界文明大势，强毅力行于此一大道之行行重行行，于力推华夏文明大转型中聚沙成塔，渐次造就新中国。否则，如中国近年之再度逐渐孤立于世界主流之势，已露端倪，则危乎殆哉。而大转型一日尚未完工，则一日天荆地棘，一日不得安生。全体百姓觳觫立世，整个邦国忐忑危行，这方水土，亿万斯民，得苟全耶？胡安居兮？！

此一心事非他，就是大转型将了未了，可望而不可即，万民翘首之时，举世忐忑之际，不料党国一体之极权政治反转，色厉而内荏，变本复加厉。

是啊，时至今日，痛定思痛，为何大转型透迤沉滞，汲汲于破局出关，却反而不进则退，退则居然退到邪恶的“东方红”？而面对政治上的全面倒行逆施，我们，“我们人民”，竟然如此虚弱，不仅层峰普遍平庸猥琐，而且，上流下流，精英萎顿，万民束手！那财富精英，平日勾兑，沾溉于开放社会理念与自由市场机遇，器器骁骁，煞有介事，仿佛挺有担当，而此时此刻，却也不过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为何三十多年社会发育，自由经济积攒下巨额财富，理念启明仿佛一波接续一波，却只是为极权还阳输氧，迎来的不过“面包加马戏团”，不仅根本挡不住独夫极权，末了居然万岁声起？中国这波长程大转型既是现代世界诞生后“双元革命”之于枢纽文明的最后一役，而它当下的破局，尤其是香江不屈，以死相搏，昭示着这是解决“二战”遗留问题的“新冷战”之最新一役，则冥冥之中，起承转合，历史无情而有义，世道无道而终归正道，苍天浩浩，庇佑中华？！此间跌

宕，恍惚暝朦，虽大势所趋，但一日难见分晓，则一刻忧心如焚，遂心事浩瀚，而心境忧伤矣！

所谓无用功者，就在于书生意气，春愁满纸，酒阑心碎，以笔为马，驭思赶路，孜孜于以理念感动世界，而汲汲于将思想现实化。但理念之落地生根，思想之影响风化，常常以数代人为长旅，则身前事，万世名，绝非此生寄居所可希冀，更非当下肉身所当奢望。倘若恰好存活于那个时点，并非理念力大，毋宁，思想有幸罢了。时势比人强，时代是裁判者，而真理是时间的独生女，正需要大浪淘沙，经磨历劫，直至头颅落地。君不见，那基督王国，那儒教乐土，千百年来，血流成河，终只是圣贤仁念，苦痛中泪眼迷蒙的悲悯。故尔，夜阑更深，念兹在兹，所谓家国天下，所谓奠立于牺牲的灵肉超越，所谓挺立于人欲而皈依于天理之天人合德，唇焦干肺，不过无用功，而寄望于春风化雨般之人间启明，有所托于迢迢来

世之大用矣。——朋友，无此无用之用与不用之用，舍此无功之功与劳而无功，衔石填海，逐日射天，哪会有免于匮乏之权利，怎能有免于恐惧之自由。如此这般，则胶鬲之困，恰为书生之福。眼前看，书本敌不过刺刀；放眼量，则爱情能将刺刀折弯。秉此以观，不妨说，眼面前这波倒行逆施，终只是一段插曲，不仅加速暴露了极权政治逆文明而动、与万民为敌的邪恶，而且事实上助推了国民的觉醒，加速了中国自由思想的政治成熟。从而，为它自己敲响了丧钟。——万民，大不了一死，须无惧！

这世间，总要有人出来讲理

人要讲理，不讲理便是禽兽。世间要有讲理的地方，否则顿成地狱。人生是一个讲理的长旅，所以生而为人却要学着做人。可是，古往今来，就是有人不讲理；人间朗朗，常常就是找不到讲理的地方；漫长一辈子里，总会遭遇蛮不讲理的人和事。有人不讲理，有理没处讲，于是，芸芸众生，愁肠百结，一不小心，便辗转于沟壑。它们如同黑云压城，让绚烂人世黯然失色，叫我们这个号曰人类的物种忍垢蒙羞。

譬如，今天下午的会址早已约定，可商家悍然背信弃约，致使我们被迫跼蹐于斗方，大家自神州四方惶惶奔至，只好“济济一堂”。这便是不讲理，无理可讲，无处可讲。因为，商家和官家联手，权钱勾搭成奸，便是那上空的黑云，理路消歇无踪之际，人间不再是

安全和安宁的居所，也就是我们备受欺凌之时。

可是，天下总有理在，人间不可或缺一个理字！要过日子，过好日子，好好过日子，一刻都离不开讲理。黑云如墨，让人世黯淡，但却无法将真理的天光笼罩殆尽。相反，天行有常，天理自在人心。这理儿如同澎湃的春水，可受阻于一时，却终将冲决冻冰，奔流蹈海。——朋友，人活一口气，讲的就是个理儿，你力气再大，能将她们永远藏于自家肘腋！？

毕竟，凡事皆有事理，是人就会有情理，人间总归不可或缺道理，一如它们必将体现为某种法理。而无论是事理、情理、道理与法理，它们无一不是天理之昭昭。天大地大，海啸山风，夏雷冬雪，是一个理字儿支撑着我们活了下来，也是一个理字儿鼓荡着我们必须活下来！

找地方讲理，把理儿讲清，是人的秉性，除非你不是人，除非这个人世堕

落成为地狱。

在此，“个案正义”与“人民出场”，是两种主要的讲理方式。

如同江平教授所言，法庭是讲理的地方，或者，应当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个案正义是讲理的一种方式。依恃法权程序安排，首先让事实铺陈于目前，从而让事理袒露于人间，道理和情理可望联袂排闷而出，流淌于心间。经由法理的精致梳理，最终讨得一个是非。可能，也终会明白仁忍高于是非，就是最高的是非。

可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庭更且常常难免为强权所辱弄。于是，人民出场，或许有助于实现正义，遂成一种讲理的方式。可能，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当今之世，人民的出场不外三种方式。一是革命，可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走此绝路。拈出此项，正在于努力避免革命，以政治改良取代玉石俱焚的山呼海啸。二是选举。人民具体化为公民，公民换身为选民。万千选民，劳

生息死，养家糊口之余，手拿选票，在挑选自家代言人的博弈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实现自己的组织化生存。各以组织化阵势陈竭己意，于容忍各自的选择中表达自己的选择，其实是代价最小的政治存在方式。而这便也就是在讲理，一个讲理的过程，并终究给出讲理的结果。三是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借由凡此方式，公民彰显自己的存在，表达着自己的选择，于讨要公道中可能促进公道。至少，它给予弱者以号哭的自由，哭声震天之时，可能就是石砌的大墙轰然坍塌之际。

人世熙攘，人性隐曲，人生仿佛一团乱麻，总有讲理的和不讲理的，也总是有能说会道的和刚毅却木讷的。那时节，虽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因而，好人与好人讲理，各拥理据，各秉德性，尽管其理轩轻，但终究保有沟通的善意，也总有沟通的可能，事情大致不会太难办。坏人与坏人讲理——如果讲理的

话，至多讲究的是盗亦有道，可能也能沟通。江湖上刀光剑影，自有一套拚搏之道。难办的是，好人与坏人讲理，哪里有理讲呢！特别是，当坏人权高位重，一手遮天之时，你到哪里去讲理呢！又特别是，当不讲理的就是政府或者国家本身，天哪，还怎么讲理呢？！小民百姓，又当何如呢？！

因而，总要有人出来讲理，这世间才为人间，也方才适于人类居住。当今之世，律师之为一业，职业所系，志业所在，就是专门替人讲理的，也可能是最会讲理的。既秉其心志，复禀其心智，他们挺身而出专门讲理，是现代的巫，而恰恰是正义的祭司！

再说一遍，这世间，总要有人出来讲理。谁来讲理，大家一起来讲理，而首先是特具禀赋的法律人出来讲理。社会之有律师一业，众生之养育了法律人，就在于指盼着他们出来讲理呢！

为了讲理，法律人，站起来；为了过上讲理的顺畅安宁的日子，亿万同

胞，站起来！

中国在临界点上

这一年来，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死灰复燃，愈发猖獗。这边厢，草根毛左不明所以，挟带着政治失意与社会怨愤，叫嚣乎东西；那边厢，高校中早已退场沉寂的文革余孽，乘势冒头，作跳梁小丑状，隳突乎南北。不仅喊打喊杀，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层面，四面出击，而且，颇有掀起某种“运动”，经由首先整肃知识界与退回到文革式政治社会状况，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冲动与势能。其言其行，已然造成普遍不安，一定意义上的社会恐慌，并导致了一种将中国拖进“全面内战”状态的可能性。经济下滑，资金外逃，官场懈怠，底层乏力，精英移民，知识界人人自危，新闻出版行业不知所措，就是这一不安与恐慌的晴雨表。因此，阻遏这一态势，拆解这一可能性，防止中国社会政治状态的持续恶化与全面倒退，蔚为当务之急。

此处所说的“全面内战”，非指武装交火，而是说法政哲学意义上，以敌我关系归类与规训国民，将斗争哲学和“你死我活”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公然指向知识界、律师、新闻出版从业者和民营资本，从而，导致全体公民政治上的非和平共处状态。由此，造成一种“人自为战”阵势中基于敌意的紧张、防范与恐惧的政治状态，乃至杀伐欲望，而非公民友爱与团结，在尤其表现为言论大幅收窄甚或噤声的状态中，结果是大家共同失去安全感，丧失对于政治前景的任何确定性预期，普遍恐惧遂笼罩人心。严重的官民对立和对于公共权力的彻底的不信任、社会撕裂与舆论极化，不过为其表象。

一、五种表现

其端倪，其理路，总括而言，大约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第一，现有体制在“维稳体制”基

础之上，正在一步步地，叠加上“战备体制”，而形成“维稳”向“战备”演进的体制形态。本来，百多年来的中国，历经战争、革命与各种酷烈政治运动，长久罹陷于一种异常政治状态，生死轮回，生民涂炭。只是晚近三十来年间，放弃革命、战争与运动思路，解构内政上的敌我界限，以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为重心，进而倡说和谐，着意营造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意象，这才逐步有望迎来一个常态政治状态，中国这也才迈进或者正在进入常态政治时代。托此之庇，国家与个人，大家好歹有些安全感，口袋里才刚刚有了点儿钱，温饱不愁，科教事业逐步复苏与发展，慢慢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西方向右，中国进一步向左，不仅周边关系吃紧，大国博弈紧绷，更主要的是，国家政治中的敌我思维重新上阵，导致原来的“维稳体制”叠加上了“战备体制”。就是说，此处之“战备”，不仅旨在回应国

家间政治，防范外敌入侵，随时准备打仗。——毕竟，当今世界体系依旧是一种自助体系，浩瀚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复兴与重新崛起，当然意味着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重组，从而，必然引发有关国家的醋意与敌意，中国不想惹事，但必需有所回应——而且，不宁唯是，更主要的是，似乎指向内政，旨在找出、标定并惩罚“敌对势力”，将不同理念、价值与意见的表达，乃至于一般纯粹基于物质利益诉求的公民维权行动，悉数当作敌对势力与敌对行动，时刻防范，随时准备“狠狠打击”，则政治形态一时间重新面临不确定性，而造成的一般大众心理感受的不安，担忧“常态政治”未曾完全落地，“异常政治”又回来了，遂顺理成章。就是说，大家担心是不是又要搞阶级斗争，搞斗批改，搞运动。甚至乎，顺此战备体制思路往下走，所谓“先军政治”，也在 中国出现了苗头。由此，东亚的军备竞赛，遂成事实。实际上，国际形势紧绷与内政吃紧，从来就是互相强化，而终

究难免彼此恶化。

有鉴于此，警惕中国滑向此种战备体制，防止整个国策为此战备体制所裹挟，进而，突破维稳体制，重启全面改革开放，在一、两代人的时段内，逐步和平过渡，完成中国这一波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既是历史逻辑，也是政治逻辑，从而，是当下此际，吾华夏民族亿万生灵的生存之道也。

第二，“和谐理念”逐步被“斗争哲学”所取代。“全面内战”的先兆，便是倡导了十几年的和谐理念不再，而为斗争哲学所取代。斗争哲学崇尚斗、斗、斗，在不过一代人之前刚刚摆脱“文革”之祸的我们看来，其之非为正道，令人不寒而栗。前几年大家反感以“和谐”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维持会长，有时候亦且多所调侃。但是，与斗争哲学相比，至少，在国家政治意义上，和谐理念虽说意在回避矛盾，可既以营建全体国民和乐融融的政治意象为旨归，则其内涵了指向全体公民政治上

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故而，虽然其派生的维稳体制叫人烦心，但和谐理念本身还算让人放心。扭转此种平庸不作为局面，而锐意进取，的的确确，是刻下政制自我修复而建设常态政治之途径，也是主动顺应近代中国历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强毅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颁行后，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但是，其轨辙，其进路，不是重启斗争哲学，毋宁，正不外执政党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所接续倡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法治国家也。——再说一句，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非突转为斗争哲学，方为进取之正途。

朋友，我们不是乡愿，不是不明白，对于政制腐朽和官场腐败，对于外敌觊觎，需要起而应对，必须有所作为，也理解一开始启用霹雳手段的必要性。但是，此与斗争哲学是两码事，更非等于斗争哲学所刻意释放的恐怖意味。毋宁，必需导向民主法治轨道，

以民主法治建设解决政制腐败，慢慢地，形成中国的优良政体，进而，以一国良制完成大中华全境之民族国家建构。当下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舍却民主政治建设，既无法说明权力来源，从而没法落实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也无法提供政治正义与宪法正义，从而，难以确立真正的法治，连真实的法制也难。此为现状与现实，无法掩饰，而直言陈述，还是盼望避免全面内战状态蔓延，赶紧结束愈益严重、官民皆有的不安与恐慌状态，则吾人百姓安居乐业也。

实际上，就大中华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这几年台港情形恶化，在已然回归之际与营造可能统一之时，苦心经营之下，不仅没有强化其向心力，反而导致其离心力愈重，正说明基于敌我划分与斗争哲学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现了必须同时反对港独、台独的问题，实在匪夷所思。同时，无论是调适与东瀛和南海诸国的关系，

还是两年来的中美互动，大凡关涉国家间政治，而与周边国家关系吃紧，需要仰仗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个斗字所能解决的。如果说此于国家间政治得解，那么，当此斗争哲学径直引入共和国之国家政治层面，就更且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所能解释，毋宁，实为极权政治思维的复辟，而恰恰导致文革式思维回归，造成此刻这般令人窒息而惶憊的全面内战式政治生态。

比如，前不久教育部长发文，一棍子打下来，将高校这一斯文发育之地定义为“阵地”，将全体高校教师划归敌对势力范围，令人齿寒。论其源流，正不外基于此种敌对思维与斗争哲学，而有此极不负责、最为卑劣无耻之言。其言其行，不仅在高校教师中无限树立敌对面，给当下的社会紧张状态添油加醋，而且，从根本理念层面上违背了政治正义，实在不配担当总绾大国教育之首席长官也。——各位，官员为

了上位与自保，纷纷以出格言论和宁左勿右现身占位，给社会大众传递的是文革式社会政治信息，其之极端不负责任与无耻之尤，影响最为恶劣，危害最为严重，怎么就不见高层警示挞伐呢!？

上述现象，考镜源流，东亚不期然间之进入军备竞争，欧美右转可能引发新一轮冷战，均为诱发斗争哲学的外因，并互为因果。而一旦陷入军备竞争与冷战，对于中国这一尚处转型进程之中的国族来说，其所追求的现代体制与国家建构尚未完全成型落地，则“现代中国”的涵养进程有可能因此中断，非为福也。中国近代史上，此间教训深重。1894年、1937年，日寇侵华，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49年后，深濡斯拉夫式蛮力极权政治色彩的犹太摩西—日尔曼式斗争哲学，参和着刻薄寡恩的法家思绪，风火相助，共同君临中国，再度打断现代中国的成长进程，直到1978年执政党三

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中国历史方始重归改革开放轨道，而以追求富强、民主和文明为鹄的。有鉴于此，今天中国切忌重蹈一战前德国式、二战前日本式与二战后苏俄式军备竞赛和冷战覆辙，相反，仍需“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建设”。否则，失却这一“窗口期”，现代化进程就此打断，而下一次机会何时才有，鬼知道。

第三，“公民团结”理想逐渐被“敌我关系”思路取代。和谐理念的致思进路是公民团结，并希望达成国民友爱与公民团结的结果。而敌我关系意识旨在区分敌我，强调“自家人”与“外人”，意味着将国民分类为敌我两方，而非共和国的平等一体的分享者。“赵家人”一语流行，正说明整个社会对此普遍不满，也不屑。本来，“共和国”这一理念意味着全体国民均为国家的所有者，当然的主权者，纵有利益之争与价值之别，何有敌我之分。而追根究源，之所以倒退回如此陈旧的非共和

国模式意识形态，就在于当下政体缺乏国家哲学，面对转型关键时刻之重重矛盾，无理论与思想利器可用，却又因为利益所在，刻意拒斥包括古典中国文教传统积攒下来的普世文明，不得已，只好重回最为熟悉的敌人论。与此同时，大国博弈进程中的多边互动所造成的步步紧逼态势，导致意识形态冷战实际上早已开打。其实，此间苗头，起自2015年初反对普世价值，到如今，对于读书人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刻意防备、戒惧和排斥，表明了一种摧残体制内外理想主义的极左思潮有可能重归主流，则害莫大焉。正是在此情形下，不仅是社会上，而且，高校中的文革余孽及其思维方式，亦且已然蠢蠢欲动，甚至开始了针对特定教师的政治攻击。因而，重提斗争哲学与强调敌我关系，实为一体之两面，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状态。

第四，共和模式淡化，党国一体形态更趋强化。实际上，是党国一体、党

政一体、军政一体和经政一体，甚至有君师一体的苗头。本来，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本义，其进路，就是要在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破解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借由党政分开而淡化党国一体。胡赵改革与胡温新政初期，基本上循此思路前行，使得国家建构的共和形态，仿佛蔚为政治大方向。可惜这几年，虽然讲得很好听，实际上党国一体的趋势有增无减，党国一体体制愈益凸显强化。而一旦党国一体形成高压态势，彻底排斥和压抑社会成长和民间发育，实际上等于以党国方式将共和作废，向全民宣战，而这与改革开放的根本思路和基本价值背道而驰，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的境地。正是在此情形下，才出现了诸如“央视姓党，请您放心”这类错位而肉麻的谰词，而产权改革、地产确权迟迟难以到位，一部物权法所能确立的不过是半拉子物权，同样原由在此。

第五，维权政治消隐，暴民政治登场。2003年开始的“胡温新政”，媒介以所谓“民权元年”嘉喻。虽说虎头蛇尾，但自此的确开启了具有现代启蒙政治意义上的民间自发维权活动，并有诸多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的范例，也是真实的。此后“奥运”在即，志在维稳，这一良性互动进程逐渐缓滞，并终究停滞，权力独大一面倒格局遂又强势回归，民间以“权力向权利的反扑”讽喻之。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相反，最近两三年来，尤其是最近一年来，不料想，维权政治停滞，暴民政治却登场了，主要表现为时不时上演的草根毛左式暴力化倾向。最近发生在济南的草根毛左对大学教授的街头围攻与“大批判”，特别是它的暴力化倾向，显系背后组织化运作的结果，并获得了警方的变相容忍和体制内的快速响应。不是别的，正是后者，让人不寒而栗，怀疑是不是又回到了“反右”与“文革”爆发的前夕。——朋友，积小恶而为大恶，汇点滴以成潮

流，所有的政治运动，甚至战争，不都是这么慢慢折腾，终于闹大，而终究不可收拾的吗！因此，街头围攻与大批判登场，及其暴民政治化，表明以治安对付政治、用政制反制政治的政体格局下，社会发育受阻，健全的社会理性建设与商谈性对话机制阙如，则暴民政治叠加民粹势力乘隙而入，社会生态恶化，正为“全面内战”的不祥之兆，需要赶紧刹车，以防不测也。——再说一句，对此草根毛左暴民政治，必须赶紧刹车，否则，作为转移与寄寓特定政治目的和发泄社会愤怒的暴力形式，必将蔓延开来，而不可收拾矣！

二、五大后果

综上五点，导致了下述五大后果，在在印证了有关“全面内战”这一忧惧。

第一，随着经济下滑，资本外逃，经济问题的深层透露的是企业信心的

下降，而其背后，则是对于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虽然有“私产入宪”，《物权法》亦且赫然在世，前不久高层还以权威机构名义下发保护私有产权的通知，但却没能唤回信心，则经济信心下滑的背后，是对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而法制之所以没有获得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是因为法制背后的政治体制，其政治道义信誉，并没有建立起来，未能获得确信，因此折射的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及其道义信仰的阙如，造成社会大众对其信义不足的全面危机。换言之，对于既有政体是否能够兑现保护合法产权这一政治承诺，并诉诸强固法制，实在没什么信心。此刻极左思潮和极左理念推波助澜掀动的全面内战态势，特别是地方公权机构的暧昧态度，无疑加剧了这一疑惧与恐慌。

第二，官僚阶层普遍不作为，文官集团软抵抗，底层创造力与民间活力正在逐步丧失。各位知道，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依恃高层推导与底层

创造力之两相配合。民间的活力，包括民营资本的创造性增长，加上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驱动与政绩推导，特别是多所缓和、宽和的政治氛围，官家不再着意伤民，少扰民，给社会松绑，凡此聚合发力，造就了三十年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此时此刻，伴随着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不仅民间活力正在丧失，底层创造力隳矣，而且，官僚集团的不作为导致的改革空转，甚至借改革的名义而行反改革之实，或者，徒有名头的假改革反倒大行其道，正在使改革所积累的政治信义，以及由此培养的全民信念，逐渐流失。由此，为了应付而无事忙的所谓改革，比如刻下的司法改革与某些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其实是一场闹剧，便为一例。

第三，最近一、两年来，面对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的日益坐大与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的回归势头，已经造成全民人心惶惶。尤其是知识阶层，社会

精英团体，包括权力精英、资本精英与知识精英，普遍感到不安和忧惧。此种情形如果再进一步加剧，可能摧毁这个社会最具活力也最具中道理性的建设性力量，同时，也就是一种大转型关键时段、各种矛盾爆发之际可得依恃的缓冲力量。其于社会撕裂之际，实际上令社会自主性——如果还有一定自主性的话——遭受重创，社会发育停滞，削弱的是中国社会最具创造力的部分。

实在不明白，中国的读书人老老实实，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情，任劳任怨，起早摸黑，为何在极左势力眼中，动不动就被视为敌对势力呢？！

第四，晚近十年，制度固化，旧体制复归。这一苗头起自奥运会世博会，只是这几年旧体制复归的步伐在高亢改革声中反而有所加速。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过去几十年来以与国际接轨为名、而行制度和解之实所积累的制度成果，有可能在强调制度竞争，而实

际上是以僵化制度、固化制度和旧体制抗拒改革开放，抗衡建设优良政体的政治努力的趋势下，逐渐流失。此种态势和心路，逐渐蔓延，甚至造就出了一批“青年左派”，与中老年狰狞毛左一唱一和，实在令人担忧。

第五，帝国情结与战略透支。最近几年，曾经的帝国，包括奥斯曼故地、波斯旧址和沙俄家乡，眼看美帝日趋疲惫而倦勤，欧洲的内向和收缩，其潜在帝国倾向和帝国情结发作，或明或暗，都显露出重振帝国的野心勃勃，而蠢蠢欲动，强化了这个本已动荡的世界愈发严重的不确定性。表面看是内外交困之际地缘战略的新情况，底下实为帝国情结作祟使然。旧舞台，老唱本，新演员。置此情形下，在一些境外观察者看来，似乎随着中国复兴势头汹涌，中华帝国亦呈王者归来之势。为此，中国恰恰需要避免此一险境与陷阱，而以内政优先，在解决好内政问题之际，再图施展也。没有优良内政与经

济的持续增长垫底，在国家间政治上也不会有吸引力与发言权。

毕竟，吾中华全境，尚有数千万同胞未脱贫困，几千万儿童失学，数千万残障人士需要扶助，以亿万计的同胞面临养老问题，更不用说时闻因为贫病交加而一家自杀的惨剧，则全体国民多少年苦下来，累下来，就攒了这么点儿的家当，怎好为了满足千古一帝的伟大梦想，拿到世界各地挥霍充冤大头呢?!

三、三个问题

上述五点表现和五点后果，至少披露了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现有政体及其高层缺乏历史感与历史理念，对于具有道义感召力的历史愿景未能以政治布局做出应有回应。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整整178年，是秦汉大变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

二次大转型，也是十七世纪初起始于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的现代文明秩序铺展开来以还，在东方的一次最为伟大的呈现，而正在引领出一个太平洋文明时代。这是世界历史大趋势，没人能够抗拒。因此，无论是清末拟定的九年预备立宪，还是民国政制设想的“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方案，都有一定的历史观，而表诸“路线图”与“时间表”。后来共产党闹革命，追求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对错另当别论，都还表明具有一定的历史感与历史观，体现了一种基于历史自觉的政治自觉。但是，此时此刻，我们除了看到“两个一百年”这种技术性表述外，看不到历史观，未曾触发历史感。各位，除非是完成现代转型、历史已然终结的国族，只需孜孜于具体公共政策层面，否则，历史观、历史感与历史愿景的阙如，是政治之大病，也是国族心智羸弱之败象，表明前景不明之际，既无心也无力，则市侩政治与平

庸政治借助权力政治统辖社会，必至极权登场，而白茫茫大地也。也正因为此，上述后果和全面内战态势，遂应运而生。

第二，当下中国缺乏国家哲学，缺乏对于国家理性的拷问、提炼与政治表达，也缺乏健全启蒙了的公民理性来制约和导引国家理性。执政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可谓顺应时势与人心。但现实情形却是，由于意识形态再度逐渐收拢，底层创造力受压，僵化体制反而复归，其表现为上述文革式思维与行为方式再度登场，内里则是因为当下中国缺乏国家哲学和对于国家理性的深层次理论拷问和思想提炼，精神贫血困乏，有以然哉，所以然载。就此而言，中国文明的法政哲学、历史沉思与伦理追问，正需卧薪尝胆，以在境性成熟思考，支撑起大转型所需之心智与心性，而不当再祭敌我矛盾与斗争哲学大旗，摧残正在发育涵养，而有望蓄势待发的汉

语思想，打压天下读书人的自由思考也。

第三，值此历史关键时刻，当下政体缺乏道义动机与基于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政治担当。此一道义动机和政治担当非他，就是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为己任，以全体十四万万中国人的福祉为福祉，而非以一党一派利益为归属。而十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最大福祉，不外是在依归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意义上，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在此刻往下的一、两代人时段内，最终完成这一波历史大转型，而缔造一个“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现代中国。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由于历史观阙如，导致道义动机萎靡，故而，未能强毅力行，肩负起这一历史担当、道义担当和政治担当，则行百里者半九十矣。

四、这是为什么？

几年前，大家焦虑的是改革往哪儿改，怎么改，怎么改得这么慢。毕竟，自1860年开启洋务运动以来，“改革开放”及其所确立的基本路向、理念和愿景，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主流历史意识，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虽几经反复，迭遭波折，却不绝如缕，终究汇聚成长河大波，汹涌澎湃。但是，仅仅过了两、三年，在一片欢呼声中，历经一百多年的奋斗，尤其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没料想，今天我们的担忧变成了“怎么在倒退、为什么会倒退、不知道还会退到哪一步？”这样的恐慌和忧惧。

这是为什么？

当然，大面儿上来说，它源于世事与时势，而辗转为今天的形势。而今天的形势，凡此不进则退与普遍担忧，正如执政党的判断，实际上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

刻，各种矛盾汇聚，却又未能正面回应，有以然哉。也就是说，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长程大转型，一个秦汉以来最为浩瀚而剧烈的大转型，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一个即将水落石出的收束时刻。因此，各种矛盾积聚其实早已提示出了核心所在，而必得有所取舍，遂有“决战时刻”一说，乃顺理成章。细言之，“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与重缔意义秩序”，揆诸凡此“中国问题”的四大义项与意向，历史进程正走到了“提炼优良政体”这一关键时刻，亟需以启动民主政治来正面回应，而非虚与委蛇，甚或逆潮流而动。因而，同样不言自明的是，其之特别需要道义担当和政治决断，既在应对眼前困境，更在导向最终走出“历史三峡”这一历史大势，更且顺理成章。

就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而言，战后维持了七十年的雅尔塔体系摇摇欲坠，因此，世界向何处去，同样面临拷

问。大国小国，都不安。大国负担重，转型中的大国身心有待发育健全，却又无法推脱大国负担，仿佛更且不安。从内政来看，离心力进一步强化，全面内战状态初现端倪，加剧了这一不安。凡此表明，的确的确，所谓的“改革开放”，换言之，中国的大转型，到了紧要的关头，也是最后的收束杀青关头。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需要启动“新南巡”，以击退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化解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与全面内战之忧。

1992年春，邓公衰年力撑，浩然南巡，将中国从1989年后的三年徘徊倒退期中扭转过来，重新踏上改革开放征程。从2013年11月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到此后的四中、五中全会，于现代立国理政诸端，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指向，多所建树。但是，如前所述，问题在于落实，如何经由制度实践，才不至于不仅不见落实，反而只见倒退，才是问题所在。而眼面前横亘在

国人心头的倒退之忧，恰恰说明时势危急，确乎到了需要启动新南巡的时候了。

说“新南巡”，不是说要某个人站出来，往南溜达，毋宁，是指需要发动这一意念，表达这样的政治担当、道义担当和历史担当，从而扭转改革颓势。有人以“正在下一盘大棋”为譬，吾不知真假。但是，若果真是一盘大棋，则什么棋都比不上富强、民主与文明维度中的“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个如来佛手掌大，而需要奋起击退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以最终完成中国近代这一波大转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而当务之急，是要摒弃内政意义上的敌我理念与斗争哲学，以改革开放的实际举措，消除关于中国可能会陷入全面内战这一普遍忧惧。

整整一年前，笔者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一文，为“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的悄然回归而预为警怵。

不料，一年来的情势发展，恰恰不幸而言中，实在是意料之中而情理之外。此时此刻，撰写本文，愈发忐忑，为“全面内战”忧心忡忡，则但愿所言落空，至少，经济不至于继续下滑，而官民两造幸甚，苍生有福，在下一介良民，教书匠，不想惹事，安稳吃饭睡觉也！

2017年1月16日修订，时雾霾锁城，窗外雪花纷飞。

保卫“改革开放”

1978年重启的大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改革开放”，连同此前两波“改革开放”，一个半世纪里，它们风雨兼程，构成了秦汉大转型之后，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革。时至今日，本当是最后收束时段，期期于踢出临门一脚，却没想不进则退。不仅“改革空转”，虚与委蛇的“假改革”流行，而且，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不期然间，均同时出现。犹有甚者，“文革”势力沉渣泛起，从怀念那个扭曲时代的审丑起步，已到公然否定“改革开放”的地步。实际上，不惟难见“进一步改革开放”，而且，政道理念与治道策术方面多有倒退之迹。因此，号曰“改革开放”四十年，改变中国，影响全球，可照此后退之趋势，大家不得不担忧会否回到毛时代，那个亿万国民觥觥偷生的酷烈人世。因而，当下时代急务，如执政党及其领袖所宣谕，既

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则必须首先奋起保卫“改革开放”，捍卫“1978”。否则，不进则退，伊于胡底。

为何必须“保卫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这面大旗下，过去四十年间，基于现代性方案、旨在解决“中国问题”而逐渐凝聚成型的基本共识，不少已然遭到颠覆或者抛弃。例如，全体国民政治上和平共处而非敌我两分的国族理念，着重于民生而非仅只国家主义光荣政治的价值导向，集体领导的权力配置与逐步走向政治改革而非重归个人崇拜与强化威权统制的大转型进路设计，内政导向的富强国策及其以建设与发展为中心而非过早大投入介入全球治理的立国路线，积极融入并建设现代世界体系而非东怼西怼的国家理性，凡此种种，这几年间均且多所修正，甚至名存实亡，而偏离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改革开

放”路线。事实证明，上述共识基于百年立国的生聚教训，实为国族自强更张、文明复兴的底线，而颠扑不破者也，岂能扭曲抛弃。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民权元年”以还十年，高层看起来大致谨慎，在庇护金字塔尖的百分之一大捞特捞的同时，却又多少展示了努力与社会和解的基本善意。也正是在此时段，社会与思想乘隙获得了一定的发育空间，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意识逐渐影响官民两界，而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念起步，也是以“高抬贵手”的方式在夯实其社会基础。最近几年间，（某些地方基层）执政风格仿佛一改前辙，公子哥派头孱杂地痞习气，而日益粗鄙化。它立基于公开的血统论，诉诸制造公民等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铺张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强化旨在排斥大多数公民分享政治的专政格局，而分享政治与政治的分享性本当为逐渐趋近之公民理想，

也是必当恪守兑现之国家理性。置此情形，中国遂成“政治后裔”们的政治殖民地和赵家大观园私宅。权力过度伸展之际，社会发育终止，思考自由遭受重创，而党政一体、党国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乃至君师一体的国家形态，却大步回归，在此百年难逢之和平时代的某些领域造成了某种“准军管状态”，实乃匪夷所思。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犹有甚者，大家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中国过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攒的家底子，几年来支撑起了政制铺展及其外向格局，实际上却多所挥霍。照此内政日紧趋势与外向型国家政策取向，钱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终有难以为继之日。鉴于萧条前景的现实可能性，可见未来时光里，会不会出现诸如委内瑞拉式的家当挥霍殆尽之情形，而导致全面萧条，实在亟令吾人高度怵惕。此刻有钱，是过去几十年

慢慢积攒下来的，皆为民脂民膏，自当首先用于内政民生。而目前的外向型政策，伴随着民资外逃、民企投资断崖式下降、国企效率不振、国民经济信心低落等等，坐吃山空，是早晚的事。那时节，收不上银子，不仅难言维稳，遑论民生，还可能引发非常政治重来。时不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嚣嚷震天而风声鹤唳，以及更为不堪之“彻底消灭私有制”云云，令好不容易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良善国民胆战心惊，其因在此。实际上，1978年之重启“改革开放”，其动机之一，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就是以“改革开放”为“聚财之道”，而终究指向富强愿景。如果连这一条基本共识和维系政治合法性的兜底之处都难再保的话，那么，吃紧之际，面对财政困境而利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狂躁以竭泽而渔，杀肥，亦且绝非不可能。置此情形下，不明就里与别有用心地缅怀“文革”，回到“文革”，就可能成为一种选项。君不见，有人鼓噪“建国一百周年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废除

私有制，进行第二次公有化”，以及什么什么理想“就是废除私有制”等等，凡此一经发酵，与失意草根的愤懑两相激荡，而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亦非耸人听闻。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而说一千道一万，之所以今日亟需保卫“改革开放”，就在于放眼世界体系大历史，迄而至今，中国这一波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接续奋斗，正处于收尾时段。换言之，“现代中国”的立国进程尚未完结，既有政体不过是一种过渡政体，作为这一政体表征的现行宪法，只能是一部临时宪法。必要等到立国进程结束，“现代中国”完型，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挺立，几经折冲樽俎后宪制定型，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的立宪时刻方始到来，“临时宪法”始望为“永久宪法”所取替。因而，这一波“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即将水落石出，而有待临门一脚，必是矛盾最为尖锐而危机四伏之际。利益格局

固化，道德动机阙如，更可能因为利益冲突加剧，而调转回头。左右为难、惊慌失措之际，可能，据有些人的一己之念，为保大观园之私，不惜祭出刀枪也。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一句话，“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进则退。倘不赶紧保卫“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往回走，但愿不是耸人听闻。

新极左

在此提醒大家的是，恰恰在此关口，几经作业，一种新型意识形态“新极左”逐步浮出水面。从邓时代的“不争论”，有意回避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而以经济建设和“奔小康”这一发展主义与民生主义统辖，到此刻的主动再意识形态化，并且不时挑起意识形态之争，主要表现为对于一系列基于现代性的立国建政共识所进行的

价值批判，对于“文革”之借尸还魂，其之来势汹汹，是近两三年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波再意识形态化，并非简单径直回归M思潮，亦非教条搬用马列原典。一味斥责其“左”或“极左”，实在太过低估了包括学院这些教授在内的文宣打手们意识形态的建构力度，也轻视了自左翼颠覆“改革开放”共识，从而维护其所希冀缔造的政统正当性的修辞技巧。

在我观察，此一可用“新极左”概括的意识形态作业，内涵相当驳杂，可谓左右开弓。既含有文革毛左极权思潮，亦糅合了某些西方白左理论，更采纳了20世纪的西方右翼理念，甚至将陆王心学牵连附会。它们几经混搭，调剂酝酿，终于发酵成今日模样。其理论面相，目下尚未完全定型，但不再是简单的文革式极左，毋宁，一种更具修辞力的“新极左”，则属无疑。旧日文革式左翼思潮，比如，强调阶级阵线阶级斗争，着力于区分姓资姓社，凸显红色

江山及其接班人脉络，鼓噪斗争哲学全面内战，乃至最近倡说的“继续革命”云云，均为基本要点。除此之外，左派学者之集体右转，勾连上了施特劳斯与施密特，乃至特朗普和某种法西斯主义极右翼观点，狐假虎威，指东打西，为此“新极左”意识形态添砖加瓦，而较旧式极左略胜一筹，粗鄙依旧，而智巧有余。因此，装点为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以重建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面目而出现的威权宰制，表现为自我殖民的“北京排华”而实则深埋于权贵裙带们阶级意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似以富强为导向而实际上涌动着帝国思维的霸业冲动，冒充为心学的唯意志论，凡此种种，遂一一登场，实为此番“新极左”推波助澜的产物，亦为其基本义理结构。说来好笑，本来，帝国研究之为热点，对于帝国霸业图景的热衷，均为右翼思潮，却主要出现于今日中国左翼理论作业日程，正表明此种“新极左”意识形态的右翼底色，而一以巩固既有格局并取悦于

权力为目的，其心态，其姿态，不打自招矣。

与此同时，努力培植小市民多愁善感的伪浪漫主义，以此作为廉价的心灵麻醉剂，经由意识形态导演与市场娱乐化操弄，双管齐下，满世界飘荡，正在成为催眠全体国民，并且甚至早已影响到一般知识界的市侩哲学。汉语知识界之平庸，既是长年钳口政策的恶果，亦为从业者自甘堕落所致，更是政治权力努力培植没心没肺的技术型专家的价值导向使然。自诩自由主义学人之学养贫乏而又汲汲于推杯换盏，实为置此情形下不自觉之自动入彀者也。这一取向与结构，要说有什么大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就是“面包加马戏团”。但是，当下的操作是以商品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娱乐化出现，经此包装，这便颇具颠覆性与裹挟力，从而，遂成新极左意识形态的侧翼。从当年满大街流行之“说《论语》”廉价劝世文，到装神弄鬼的国学热、礼拜大

师、参禅悟道，再到后来的娱乐至死，迄至此刻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用心去爱就会原谅一切”，使劲儿摧残智商、愚弄情商，均为其表象。

诸君，凡此商品消费主义小市民多愁善感，于常态政治条件下的亿兆生计，可谓调料，并无不当，适为所需，不惮其多，唯恐其少。俟诸中国这波必将前后延宕两百年的大转型完成，一般不再有啥要命的事，成天介儿的将会是此类市民娱乐，充盈市井的必是此番市民社会的常态常情，可预期者也。否则，对于多数温饱有余的市民阶层来说，起居于刻板作息时序，则平庸时代的无聊时光怎能打发。可问题在于并且仅仅在于，面临大转型收束时段这一非常时刻，一方面打压以直面问题要害而进行深度严肃思考的国族心智，乃至连“宪政”也成了敏感词，另一方面却又神剧满屏、伪娘娇喘、催眠有加，则其祸心自现，而于国族心智、心性、心志与心灵，适为一剂

麻药矣。其所针对和解构的是真实甚至酷烈的历史叙事与前瞻性愿景期待，消弭的是直面现实而正视中国大转型有待最后收束的政治意志，诋毁的是几经摧残而亟需养育的国族道德心气，实在祸莫大焉。

置此情形下，对知识界噤声日严、言论口子越收越窄，与上述种种并行呼应，共同以阻隔对于政治德性的自然法式追问，对于生活方式的超越性伦理审视，而造就一种承认现实之无可奈何，暗示“认命”的犬儒主义生活哲学，作为此种“新极左”意识形态的侧翼，遥相呼应，可谓智巧矣。

本来，汉语学术、思想与文化的持续发育成长应足以支撑国族政治身躯的发展，适相比配，这个叫做中华民族的政治存在才能身强心健。可随着言论管控日严，这一势能减弱乃至终将窒息，则无脑政治势必莽撞，如同无眼跛脚巨人用力过猛，踉跄之下，必有扑倒之虞。毕竟，时至今日，再也无法

用经济蛋糕消泯民族的道德愿景，更不能以此取代抹煞伟大国族和亿万公民的政治理想，反智主义与心灵鸡汤式的多愁善感是市民生活的万应灵丹，却不应用作麻醉国族政治自觉的廉价毒药。

因此，这一波新极左意识形态，包括何新式的精神疾患式臆想、强世功厚脸皮往上贴的东拉西扯、孔丹们这些自以为是而实则半吊子的政治后裔们早已过时的粗鄙操作、搬弄些现代西方白左和右翼思潮的学院跪舔一族的拼拼凑凑，终于构成了其理论作业和思想表达形式，需要引起知识界的高度警惕，而将建构理性刚健的国家伦理与法治国理论，首先是符合常识、遵循人道、不违人性的政治理性，作为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中产阶级必须担负政治责任

至此关键时刻，中国的中产阶级必须自觉实现政治成熟，担当起主导性社会政治力量的历史职责，尽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依照某种官方意识形态，“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一基本架构，奠定了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至晚1950年代中期以还，中国的资本阶级不复存在，本来与资本阶级相对应方始存在的工人阶级，自此变成了孤家寡人式的“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吃喝拉撒悉由单位做主，生老病死皆在围墙之中，以单位人的孤立状态直隶于国家，实际是隶属于各级政府及其企业。这不是什么工人阶级，毋宁，一种二十世纪的“城市工业胥夫”而已。就是说，中国政治版图上，本来就弱小的所谓“工人阶级”，至此不复存在。

这一波“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和

民资崛起，意味着资本阶级重新登场，有可能自反面重构工人阶级，可“招商引资”的官方路线决定了权力必与资本抱团取暖，共同对付劳工阶级，包括严禁真正工会与劳工援助团体活动，而使得工人阶级终难成型。同时，由于“砸三铁”与国有企业经由改制而完成了权贵化过程，将原有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彻底打散，导致在资本阶级重新崛起的同时，遂以三亿没有任何国民待遇的农民工填充进原有的产业工人队伍，不仅再度造成孤立无援的个体面对庞大权钱一体的权贵体系的格局，而且，是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涣散的、从而必定是廉价的二等公民劳工群体。经济学家名曰“蓄水池”，谓为“比较优势”，道尽其真相，却又荒唐至极。

换言之，在此情形下，所谓的工人阶级依然不存在，因此工农联盟也不存在，农民更是在半个多世纪里承受了中国社会政治变局的多数苦难。因

而，当下权力所依赖的阶级基础遂成真空，实则以权贵资本自家人小圈子为基础，表现为“政治后裔”们全面占领国家、全面垄断原始资本积累的利益收成之后，以一个小圈子内部既得利益为基本盘，而继续占领这个国家并分享既得利益的固化局面。那边厢，与“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实质并列的，是明面上铺陈的所谓“人大代表”，其之自编自导自演，毫无代表性，不仅是“高贵的陌生人”，而且，多半时候，适为人民的异己性存在。

“政治后裔”们投身“改革开放”，挟带着天然优势，早已从当年的共同奋斗者变成今天“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占有者，不意间，几番辗转腾挪，已然丧失了政治感，更是毫无政治激情，完全不再有任何推动改革开放并将这波大转型推进到底的政治德性和道德动机。利益格局锁定，最大的利益动机便是固化利益格局，坚守基本盘，表现为“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心理结

构，心照不宣，心知肚明，而使得“进一步改革开放”遂不可能。换言之，置此情形下，拒绝分享利益分成，希望永固基本盘，成为这个社会之所以走到今天不进则退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此时此际，既需要重启利益动机，以利益撼动利益，以权利制约权力，还需要启动道德动机，用充盈文明自觉的历史意识、强劲的国族心性与健全的良知战胜政治市侩主义。

在此，谁能破局？如何破局？如前所述，陈义于“政治后裔”们，已然是无用功。草根阶级吗？不，他们是可以收买的，也是可以恫吓住的。毛毛雨，小恩小惠，实际上已经收买了。其生聚，其甘苦，历来只是历史进程的参照因素。城镇市民阶层，一种市民社会的群众，前政治与无政治的存在，因无阶级自觉，消泯于“搞点儿小菜菜吃吃”，不成气候。至于民间零散出现的大量维权行动，激于义愤，息于治安，止于民生，并不足以重启“改革开放”。另一方

面，城市底层普遍的不满已然弥漫，并开始出现了“文革遗民”们回归旧时革命记忆乌托邦、诉诸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等旧时话语工具的现象，再不有效扭转，以主导性阶级意识同化含摄，则危乎殆哉。

因而，此时此际，鉴于“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已名存实亡，政治后裔们为核心的权贵资本德识卑污，上述诸种社会因素涣散，表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呼唤新兴中产阶级在捍卫经济权利的同时，必须赶紧走上政治前台，自觉提升政治地位，在政治实践中实现政治成熟，争取政治主导权。而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培养政治感觉，提升政治责任意识，实现政治成熟的伟大斗争，也是一个对于全民族的自我政治教育进程，目的和结果是且只能是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为此，中产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中国这个大转型收束时段的国族政治意识的担当者，激发自己“有

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在此，如果说执政基础及其代表性的话，那么，不是别的，就是这一新兴中产阶级，将它做大做强，并自觉以此为基础，才能获得执政合法性基础。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的共同受益人，“中产阶级”意味着最大的统一战线，最为稳定也最希望稳定的社会力量，从而，也是最有可能担负起政治责任的政治力量。所谓的“人民”不仅要还原为具体的生民、族民、市民、国民与公民，特别是选民，才能彰显人民的主权者位格，而且，必须具体化并坐实为此刻所谓的中产阶级，才有政治意义。在此，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养和觉醒，从而作为体系化的力量之获得自家的政治意识，其实不是别的，就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应当享有相应的代表性的权力意识。因此，对于中产阶级之为主导性社会政治力量的呼唤，就是在将人民坐实，从而，坐实真正的主权者位格。其之发育成长，可能，才是破解利益动

机固化、道德动机不足，从而重启“改革开放”，而首先是“保卫改革开放”的基础所在。因此，爱护中产阶级，千万不要摧残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福旺所在，也是真切的执政基础。什么“三个代表”“四个全面”，还不就是基于他们并为了以他们为核心的生民之福吗！

笔者此番陈言，多受马克斯·韦伯及其身处其中的德国近代历史的启发。有感于十九世纪末期容克贵族既得利益集团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却又衰朽不堪，早已落后于时代，难能迎应急迫内政转型与扑面而来的世界体系的挑战，而市民阶级未老先衰，早为市侩所染，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足以担纲领导者角色，导致德国难以发育出成熟的民主政治与国族心智，纵使外表强健，实际上却无主导性力量，一有风吹浪打，必然不堪一击，韦伯乃呼吁德国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以及以资产阶级为轴心的整个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重启社会

发育与政治建设进程，以此为锚，动静出处之际，德国这艘大船方始有望平稳远航。而后来国家社会主义极左民粹叠加纳粹，彻底扭曲了这一历史进程，裹挟中产阶级，正是违乎此道，遂至灾难连连也。

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过往五年，以“反腐”为旗帜的政制行动展现了兼具政治担当的政治意志，于吏治整肃方面已见行政效果。与此同时，大国互动刚柔相济，以亚开行为标志的全球财经布局有条不紊，怼南海硬是怼成了既定事实，叫美日奈何不得，凡此事功，非牛人不能为，亦且有目共睹（不过，却又催化出一个美日印澳的围堵，另当别论）。正是在此进程中，总统制式的集权仿佛完成，格局已现，则“既集大权，请办大事”，遂成此刻国族历史进程发出的激切时代政治呼唤。

那么，什么是大事？朝野左右，自有看法。但是，不是什么“解放台湾”，也不是一味无谓怼日怼美，则无疑义。若以“武统”而实现一统，期期以为大事，可谓阴招，高级黑。另一方面，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如同“改革永远在路上”，既是决心，也是遁词，不成其大也。毋宁，如舆议所言，实施官员财产阳光制度、全面减税、扶贫、振兴乡村尤其是乡村基础教育、建立合宪性审查机制、推动司法独立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强化人大预决算权力、设置专职人大代表并坐实人大代表选区、容忍多元媒体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凡此种种，均为“大事”，不妨一件一件，即刻起步，慢慢办。

尽管如此，对于身处今日这一历史节点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大事，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置于两千年历史长河而堪为其大者，就在于最终完成这一波已然延续百七十年的历史大转型，于进一步坐实现代中国“1.0版”的基

础上，建设“2.0版”现代中国。

此话怎讲？原来，现代世界历史三百多年，中国近代历史百七十年，是一个“双元革命”的浩瀚进程。此即所谓“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两元并立，支撑起现代国族大厦，也奠定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前者为现代国家的“1.0版”，是要在文明立国的基础上建构民族国家，彰显文明的主体性。后者是现代国家的“2.0版”，旨在自由立国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国家，实现“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主体性。两相叠加，双元接续，建立起的是现代政治国族，一个亿兆生民的共和家园。其中，民族国家所建构的主权体列国体系与民主国家公民理想所倡扬的永久和平，二者紧张并立，构成了所谓“现代秩序的世界体系”，而为现代文明之现代生活也。

现代中国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有机参与者，亦为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一进程与体系，具体到

吾国情形就是，中国之为民族国家早在“1911”奠基，历经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接续奋斗，第次坐实，蔚为大观，有待收束。而中国之为民主国家，正在建设进程之中，有望于未来一两代人的奋斗中，力争理性和平，随着这波大转型之收束而毕竟其功。由此，“文化中国—文明立国”与“政治中国—自由立国”，两维挺立，邦安国固，国泰民安。因而，“中国”与“现代中国”不是别的，是文明与政治的统一体，人民与城邦的共同体。抑或，以“大事”促大事，需要尽快启动现代国家的2.0版本，如此方能促使这一波中国历史大转型平稳落地，现代中国最终加冕，而为此现代世界历史收束。此为世界历史国族的赤县神州之天命，亦为当下国族政治进程的内在脉络之启示，有待此刻展现充盈历史意识之强劲政治意志，而起脚迈步也。

回首一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现代世界历史大转型中与英国革命、

美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并列的八大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模式”涵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智利、南韩与中国台湾等诸种情形。其之起步于右翼极权，而终于民主政治，堪为奇迹。尤其是专政者凭借个人权势与声望，以良知回应历史，借集权而还民权，力挽狂澜，启动民主转型，实现光荣革命，进而完成和平过渡大转型，实足彪炳千秋。

江河汤汤，人世泱泱，瞻前顾后，东西映照，立足当下，在此可得陈言者，一句话，“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为此，配合上述诸项可得即刻动手的“大事”，作为一种过渡性处理，则坐实法理上的最高权力，使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向法理上的最高权力靠拢，亦为选项。此不惟重申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非只是工作机关，宪法之不可摇撼，更在坐实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项基本公民权利之神圣不可侵犯矣。

临了再说一句，“政治后裔”们自

1978大步后撤，固守经由“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排斥其他阶级阶层的分享与参与，说明其心智与德性，已退化为小市民的政治市侩主义。逮至诉诸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钳口日紧，等于重拾专政理路，表明不足以担纲历史进程。正因为此，国族建构未能从1.0版本进入2.0版本，经济建设主导到达此刻这一程度后未能转换为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设轨道，表明政治后裔们的政治感丧失，政治德性隳颓。因而，启动已然延续百七十年之大转型之临门一脚，完成国族天命，要求“既集大权，请办大事”。否则，毕竟还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政治上毫无教养的市侩所领导。”

本文系作者2018-1-9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上的演讲修订稿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四项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

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

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

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

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

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飧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

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

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

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

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打黑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

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

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

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

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

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

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

间调侃，鉴于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

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

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于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佯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

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

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别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

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

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论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

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

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

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覆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

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纵使此间涉及“战略布局”，但难免搅入既有大国博弈，而导致战线过长，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

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

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于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

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准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

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于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

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像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

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

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于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于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

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国际反洗钱组织“艾格蒙联盟”（Egmont Group）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刹车。

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挂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痛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

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第八，平反“六四”。

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于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

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于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

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于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于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于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

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论心态与脉络来看，基于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于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别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准，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

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毕竟，“子产不毁乡校”——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

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于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于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觊觎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

「庆祝大会」定调：「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笔者对此深表赞同。惟须补充说明的是，正因为事关国族命运和小民身家，则何为「该与不该」，怎样才算「能还是不能」，绝非一党一派说了算，更非独操于宫闱政治暗箱作业之手。

【编者按】本文为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为纪念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而作。文中从历史宏观脉络起笔，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世界格局中所处位置，并直接回应了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本文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转发、参与并讨论。

现代早期以还，地中海文明一马当先，大西洋文明继起，再第次扩张至太平洋文明体系，终于将全球裹挟一

体，造成了这一叫做「世界体系」的现代秩序框架。其中，仅就「二战」以来全球秩序观察，其之依然未脱雅尔塔体系，缠绕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说明世界体系一旦形成，非时代根本有变，否则不足言变。凡此秩序体系，历经三、四百年，渐次砥砺成型，全球伸展，遂为典范，伴随着世界性文明大转型而来，框含起现代世界及其政经安排。它不仅意味着一整套现代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特别是全新的政经安排，而且也是一种文明典范，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义理结构，铺展出文明论意义上的全球景观，从而，形成了具有全球同构性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核心治理结构。晚近三、四个世纪里，笼统全球文明走向与政经实践的，其基本框架，其结果形态，即此世界体系也。

中国的三波「改革开放」，绵延一个半世纪，就发生在这一世界体系之中，跌宕逶迤于自大西洋体系向太平洋体系的扩张之际，并煎熬于此刻印

太格局雏形初现时节。因而，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及其「改革开放」，必须回到世界体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视中国，方能获致完整印象。其间，以「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为主轴的「双元革命」，贯穿始终，蔚为经纬，而以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特别是正在中国上演的最后一役，演绎着「历史不终结」的恢弘壮剧，并必将为此长程历史作最后的收束。

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及其「改革开放」，必须回到世界体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视中国，方能获致完整印象。

一、八大问题、转型四系与双元革命

十六世纪晚期、十七世纪初期以还，伴随着荷兰的现代进程与英国革命，世界不期然间逐步迈入这个叫做

「现代」的时代，而有一个现代秩序、现代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发生论。其间，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两岸扩展，再推及全球，递次出现而解决、对于现代世界的创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概莫八大问题，而以八场政治革命的方式完成，启动和回应的是近代世界性文明大转型，最终形成了上述双元革命格局。两个国家版本，搭伴联袂，前后脚来到人世，演绎出人类群体生活治理体系的两个世代，而二位一体，于提炼国家理性与民族理想之际，弘扬公民理性与公民理想，基本底定了这个叫做现代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由此造成完整的现代秩序和世界体系。这是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蔚为三、四百年以来最为重大的地球事件。

凡此八大问题，或者八大案例，依其顺序，概莫「英国问题」、「美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西班牙问题」、「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转型，规模既宏，进

程跌宕，自成一脉。其中，「英国革命」开启现代端绪，主要讲述的是古今之变。「美国革命」以自由人的选择自由和自做主宰的人权，于撕裂甚或摧毁母邦大英帝国之际，而另立新国。「法国问题」及其「大革命」，源自从路易十六开始的改革，却因旧制度不恪重负，导致最终崩盘。此后德、俄转型，另有跌宕，至为惨烈。除此之外，还有一脉典范，不妨名曰「西班牙问题」，包括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智利，或许还可算上韩国与中国的台岛，乃至至于今日的缅甸，所讲述的是独裁者在专政最后时光逆转历史，或者，顺应历史，亲自主导了民主进程，实现和平过渡。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希腊的帕潘德里欧、西班牙的大独裁者弗朗哥，以及中华民国政体下的蒋二世，都是这号人物，例属这一类型，不妨统称为「西班牙革命」。

上述八大案例，归纳起来，实为四个系列，可谓「转型四系」，或者，「革命

四型」。此即英美一系的「英美型」，德意日一系的「德国型」，法俄中一系统归「法国型」，以及「西班牙型」。凡此四系，庶几乎描摹出这个风云跌宕大时代的完整图景。非洲大陆与拉美诸族，超愈一个世纪的变革转型，生聚教训，不出上述四型笼统。

这一、两百年里，中国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中国问题」，一个世界体系背景下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问题」，既是构成此刻这个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本身最为核心的元典性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近代大转型最为典型而复杂的案例。在此，近代中国的大转型是中国历史逻辑自身演绎的必然结果，接续策应的则为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的历史进程，而汇入并推展为太平洋文明时代的宏大格局，并有望于未来以中国文明的在境性思考为此普世大转型收束，收归于下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役。

「中国问题」统归于「法俄中」一

系，就在于其政治革命的狂飙突进，不仅时段延绵，而且惨烈异常，尤以俄中为烈。另一方面，就转型半途跌宕而后「重启改革」而言，则与德日一系分享了历史进程「断而后续」的特殊性。德国于「1871」奠定国家形制，却不幸搅合于两次「大战」，实为歧出，直待「1945」和「1990」，方始接续，重新出发。故而，1945年后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发，德国则回到魏玛、回到俾斯麦，一如「1978」的中国回到「1911」，回到「1945」，甚至于回到「1860」，采取的都是「向后倒退向前进」这一曲折进路。同时，中国已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中经辛亥光荣革命，而后内战酷烈，却又类似于英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再者，放眼大中华，则台岛转型启动于独裁者晚年基于无可奈何的自觉，循沿的仿佛是西班牙一系的轨迹。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问题」及其大转型的超级复杂性，由此而有下文将要论述的「最后一役」的复合性质。

二、五场战役

在此浩瀚进程中，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哲学逐渐成长，并因其抉发人性，张扬理想，对于「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这一人类合众群居的根本问题做出了有效体制安排，遂应时顺势，其势汹涌，其力澎湃，历经五场战役，终于塑造出了这个现代人世，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而可欲的人间秩序。

第一场战役，「古今之变」，行进于英法革命与美利坚建国进程，抽绎出自由主义的人性观念，提炼出关于惬意人生的基本理念，铺展开来了立宪民主的内政框架，特别是宪政安排的政治技艺，于古今之变中作育新型人世。由此奠立了「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思想和政治基础，而以其人道意义与政治典范性，引领这个世界走入真正现代。关于「现代中国」的道德憧憬和政治想像，包括已然落地台岛的政制实践，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笼

统，均为这一西潮汹涌拍岸的飞溅浪花，也是世界性民主大潮的华夏善果。

第二场战役，「海陆之战」，表现为「一战」的惨烈起落。当其时，英法自由放任式经济体系与普鲁士组织化国家主义短兵相接，势不相容，遂一决高下。某种意义上，就帝国争锋来看，这是发生在陆上容克贵族式帝国主义与海洋霸权国家之间的博弈，蔚为海陆之争，也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殊死较量。就其帝国之战的性质而言，将「一战」称为帝国主义内部的一场混战，而「春秋无义战」，也有道理。但是，战后四大帝国解体，魏玛共和诞生，从而得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却也是事实。否则，后果更且不堪。不过，自由主义的惨胜，成果有限，而埋下第三、四场战役的隐患。

第三场战役，「文野之别」，以「二战」为主战场，并间歇延宕至1970年代中后期。这场反法西斯与抗击纳粹之战，捍卫的是历经忧患方始建立的自

由民主政治，所要超克的是现代性的野蛮性，终于以再度重申人权和自由的至高无上告终，并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全球秩序、世界体系及其基本规范。至于1970年代中期西、葡诸国与东亚部分地区相继从右翼极权纷转为立宪民主政体，则为其余脉，于时隔三十年后，轰然回响，而大厦倾矣。若说教训，则「二战」的最大败笔在于，为了击败法西斯和纳粹，乃与苏俄合作，以至于养痍遗患，灭小贼而肥大寇，不得已后来以冷战终结，这才人间晴晚，天道好还。战后差不多半个地球的苦难，数千万人死于左翼极权暴政，远超「二战」本身，皆源于此。

第四场战役，同样是「文野之别」，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冷战」，发生在左翼极权国家与自由民主联盟两大阵营，以前者的彻底崩溃而告终。其所再度撬动的现代世界的文野之争，以自由民主政体的人道对抗全面专政的暴蛮，并终于赢得胜利，再次证明了自由主

义所迎应抉发的人性善良之不可凌辱。曾几何时，苏俄式嗜血极权政体，凭借「人为的辩证法」，施行全民人身强制，厉行书报检查，于说明和论证自认铁律的历史辩证法之际，用大墙和铁牢来印证。亿万众生，无名无姓，分纳于敌我阶级的框格之中，随其起舞，成为这出闹剧的缤纷道具和通向虚幻历史愿景长旅上的道道枕木。铁桶之内，不仅「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不行，就连「内心的流亡」也不准，文明遂在一夜之间溃退。因此，冷战结果以共产极权的一夜崩溃结束，不仅是自由保卫战的胜利，也是文明的凯旋，更是人性不屈的颂歌。邓公南巡发生于1992这个时间节点，此为所谓「大环境」的重要因素。而此后以局部让利于民和有限容忍市民生活的方式获得政制回旋余地，乃至反不学好，却渐次发展成为「大数据极权主义」，同样在于以苏为鉴，取其偏也。近年来左派文人以「学习型」状述其政，说对了一半，就在于只学有利于专政保存之术，而了无皈

依人道普世大道的向善之德。若论晚近危害华夏最烈者，莫若苏俄与日寇，如陈寅恪先生当年之预言，证诸青史，不予欺也。

第五场战役，也是最后一役，正发生于此刻的中国，以华夏为舞台，综合上述诸战特质，并叠加上「中西之争」。首先，在内政层面，它是中国近代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指向民主中国与宪政中华，与曾经的「日耳曼-斯拉夫式」野蛮性的对决，已见诸港台民主法治的局部善果，而势亦必铺展为华夏秩序。当下胶着，野蛮性再度发作，遂令举国焦灼。其次，就世界体系来看，它是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与中国式「大数据极权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决战。后者以党国统驭，君临天下，绝对垄断一切权力，对于国民财富进行无度汲取，奉钳口政策为维稳第一要务，造成了「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和君师一体」的窒息局面。而五位一体，笼罩全民，其势

愈炽，长此以往，将了无希望。故而，较诸前此四场战役，这场最后一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合性质。说白了，就是华夏文明不甘曾经的日耳曼-斯拉夫式蛮力，而回归文明传统与普世大道的奋力反抗。若说「惊涛骇浪」，莫此为什，其能阻挡耶！

中国式「大数据极权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以党国统驭，君临天下，绝对垄断一切权力，对于国民财富进行无度汲取，奉钳口政策为维稳第一要务，造成了「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和君师一体」的窒息局面。

至于为何说此乃最后一役，就在于它发生在文野之别这一秩序之中，而以进入世界历史为前提。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其他尚未进入民主政治境界甚至有待建构民族国家诸族，必先进入世界历史，然后才能登堂入室，在文野之别的砥砺前行中，再成高阶民主治理之国。而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

程，不可见于可见未来，故尔另当别论。可以预期，一旦「最后一役」结束，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终于完成现代大转型，必影响风从，带来多米诺骨效应，整个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诸族诸国，将会随之大变，世界现代历史进入收束时段，而有待未来再接再厉，开启第二期现代文明也。

三、最后一役的复合性质

惟此最后一战，叠加了前此四战的各种要素，展现出「古今之变、文野之别、海陆之战与中西之争」的综合特质。凡此四重关系，牵连纠结，加剧了华夏大转型最后临门一脚的空前难度，也是其迟迟未能毕竟其役的原因所在。

首先，当下发生于中国的这场战役，接续的是晚清启动的古今之变，恰与第一场战役若合符契。其他转型诸族，同遭此厄，有喜有悲。俗常所谓「反封建」，实指以民权共和取替帝制一统，

既见诸英法革命，亦为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主旋律。经此一役，王朝政治与朝代国家不复存在，代之以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升级版之民主共和。至于美利坚立国之挣脱宗主统辖，类似于近代中国之反抗列强，而延展于下述中西之争，却因当日中国文明的中世形态，而不妨统归于古今之变。刻下中国政制既是列宁式党国之「五位一体」，已如上述，同时却又延续了王朝政制，奉行的是「某某代」这一道统观念，特别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王朝政治。故而，「反封建」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依旧有效，演示的仍为古今之变。

其次，此刻正在进行的这场战役，还具有海陆之战的意味，表现为组织化的国家威权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歧，而类如「一战」之际的英德关系。只不过，以所有者缺位为主要特征的党国资本，将极权与资本两相配合，你依我依，远较当年的容克贵族政

体有权有势。与此同时，从政治地理学而言，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之国，而传统上为欧亚大陆东端的陆上强国，此刻为了突破海疆岛链，伸展海权，还真的就遭逢到了一场印太战略格局中的海陆之争，使得政经形态竞争与地缘利益分配搅合一体，尚须细加辨析，分别应对，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这场最后一役，根本而言，还是一场文野之战，其所面对的是全能型「五位一体」大数据极权主义，一种滥觞自华夏传统中刻薄酷烈的法家文化偏锋，叠加上苏俄全能主义极权政治这一西方文明现代性的野蛮性，两相结合而成的怪胎。

再次，这场最后一役，根本而言，还是一场文野之战，其所面对的是全能型「五位一体」大数据极权主义，一种滥觞自华夏传统中刻薄酷烈的法家文化偏锋，叠加上苏俄全能主义极权政治这一西方文明现代性的野蛮性，两相结合而成的怪胎。就前者言，所需

启动的是中国文明的理性中庸的文教传统，以求超克；就后者看，非调动自由理念和民主政治不足以击溃之。置身二十世纪以还的当今世界，这一极权政制作恶多端，展现出最为邪恶的强势，是现代世界中真正的暴蛮。时至今日，其残存于齐烟九点及其周边，抱残守缺，负隅顽抗，看似得意，实则已呈颓势矣。

最后，毋庸讳言，此刻正在上演的尚有中西之争，表现为中美博弈，而内里则牵连全球权势转移与世界文明消长。晚近中国的成长，得力于亿万国民节俭勤劳，借力于全球产业体系，引用的是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成果，而在多个领域逐渐迎头赶上，逐渐展现出可能改变近代世界权势格局的态势，这才引发了四邻阵阵不安与某种烦躁。抉其隐忧，就在于一个大数据共产极权国家崛起，有如异数，令人联想到曾经的苏俄红色帝国，则势必时时提防，处处设限。如此作业之时，误解和曲解

难免，对立与对抗加剧，已到摊牌时刻。此为自保本性使然，要在双方妥善沟通。尤其是海洋航行自由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于先发国族抑或新兴强国，不言而喻，均无不同，更成焦点所在，其来有自。在此可以提示的一点是，可以想像，纵使未来中国完成立宪民主转型，亦非等于完全排除此类权势争锋和文明误解，但民主国族的价值同一性，「自己人」认同，必有助于化解，乃至彻底消解紧张。虽说民主国家无战争并非万能保票，但「二战」后民主国家从无战争的七十年历史，对此早已提供正解。只要能避免战争，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就是胜利，双方的共同胜利。在此，吾国非能置身世界历史之外，更且早已深嵌于这个世界体系，为何不能择善而从，而非要固守僵化党国体制，自树为敌呢？！

以「战役」命名这场主要体现为文野较量的四重博弈，只是修辞譬喻，恰在追求和平，一种将「立宪民主、人民

共和」落地华夏的和平进程。

综上所述，最后一役的综合性，决定它的复杂艰难及其世界文明史意义。同时，说到这里可以看出，以「战役」命名这场主要体现为文野较量的四重博弈，只是修辞譬喻，恰在追求和平，一种将「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落地华夏的和平进程。不仅是结果的和平属性，也在于手段的和平选择。此为自由理念与专政暴蛮的区别所在，而期期于以自由立国导向永久和平矣。

四、重申四个观念

对于上述五场战役，特别是最后一战的世界性地缘政治意味和全球文明史意义，而首先是对于劳生息死于这方水土之上亿万斯民的生存论意义，吾人须有清醒认识，切不可掉以轻心，自不待言。而应对之道，不是以陈旧意识形态和过渡政体来顽抗，更不能为了保住一党一派的专政私利，以亿万

苍生的身家性命做人质，将中国当成了予取予夺的殖民地。毋宁，须于“低头致意”中，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大道，也就是中国的繁荣文明之道。而当下所能做的，还是不外立足世界体系，循沿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重启“改革开放”。所谓和平，则和平在此，而不得已亦且在此。

始自1978年三中全会的这波“改革开放”，已于五年前终止。此后不进则退，倒行逆施，却又仿佛藕断丝连，挂羊头卖狗肉，大家遂于忐忑中保有一丝流连，在忧恐中彷徨四顾，而多少依然期待奇迹发生，企望或许会有柳暗花明，哪怕只是一丝一毫。逮至“四十年庆祝大会”落幕，号曰“庆祝”，实为葬礼，正式宣告“改革开放”彻底结束，大家这才明白，路已堵死，不再期待当轴会有任何把历史往前推进一步的实质性举措了。

逮至“四十年庆祝大会”落幕，号曰“庆祝”，实为葬礼，正式宣告“改革

开放”彻底结束。

放眼大历史，此为逆流，不足为虑，终亦必雨过天晴；置身当下，则可能延宕数载，不仅让一两代人报废，更可能令华夏大转型再次失去历史时机，葬送已然超愈一个半世纪建设“现代中国”的落落大业。另一方面，当下世界体系正在进行重大调整重组，时不我待，一旦贻误，则伊于胡底。怎么办？在此，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只能循沿“改革开放”这一和平路径，积蓄重启改革的时机和力量。为此，必须重申下列四大观念，再次呼唤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

首先，回归“现代化”这一基本共识，恪守“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基本底线，而且，明确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这一严峻现实。如同前此两波，这波“改革开放”源于中国置身现代，却瞠乎其后这一冷酷现实，而于追求现代化中起步。左右分歧，朝野异志，独于现代化并无异议，正说明其为共识所在，也

是迫于国族生存压力的不得不然。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性），怎样才算是现代化（性），其为单数抑或复数，凡此仿佛老掉牙而实则依旧悬而未决的理论性作业，其实早有答案，那就是不管何种现代化（性）方案，均不能少了政治民主化。因此，纵使尚存理论争议，也不妨在试错中走一步看一步，日进一寸，逐步前行。毕竟，直至今日，一个依旧冷酷的现实是，虽经一个半世纪的奋斗，中国还是一个半现代之国。不惟尚存前现代之广大乡镇，致令中国因为城乡悬隔而危乎殆哉，而且，政经转型均在途中，人文兴盛有待作育，恰需接力，恪尽前程。至于现代化之肯定、一定和必定指向政治民主化，也就是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中国躲避不了，逃避不得，也对抗不得，何所其能耶？当此之际，半途而止，不进则退，亦必将前功尽弃，君能万岁独善乎？

直至今日，一个依旧冷酷的现实是，虽经一个半世纪的奋斗，中国还是

一个半现代之国。

在此，所谓“用几十年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实为昧于事实、毫无历史意识的痴人说梦。君不见，始自洋务自强运动的现代追求，延展为清末变法、北洋新政和民国经济建设的接续努力，再经晚近奋斗，一百六十多年里，前赴后继，劳心劳力，更有数千万人横尸沟壑，这才蔚然有成，粲然大观。切断历史，抹煞前贤的积劳积慧，而独自骄矜，如同对岸老美倥论“我们重建了中国”，同为贪天之功，恬不知耻，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因此，笔者在此不吝笔墨还要提示，也是人人熟知而未必真知的，就是中国今日必须正视自己并非全然现代之国这一尴尬现实，毋宁，尚须于未来几十年里，继续这一现代事业，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也才真正有望过上安稳日子。那时节，你想玩弄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的迷彩套路，就使劲儿尽管嗨吧。但是，先走完这一进程，这段路

不走完，半道歇火，朋友，随时就是回头路，而必龙椅再现，定于一尊矣。

其次，也就因此，必须明确中国尚处转型时段，所谓“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是别的，而是指必须恪尽这一大转型，最终走出转型时段，进入常态政治，建立常态国家。一天走不出，一天尚未完成这一进程，就一天难言这模式那模式，更不可能津津于“大功告成”的自我“庆祝”。此亦非他，不过就是笔者在“低头致意，天地无边”中所言，以行政调整和事务性变革，冒充“改革开放”意义上的大转型，来搪塞糊弄举国深化改革要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毋宁，虚与委蛇也。在此“第三波改革开放”的意义上，“将改革进行到底”意味着不可能“改革永远在路上”，而必有终点，请你向全体国民讲清道明“时间表”与“路线图”。而终点就是建立“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现代中国，把选票交还到每个公民手中。这几年国人不满日甚，正

在于此类虚招繁多，早已让人生厌，进而在将改革污名化之际，令大家一起失望而揪心。因而，明确中国尚处转型时段定位，意味着一切尚未成为定局，惟以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为准，赶紧破局前行。就此而言，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开始立宪民主政治，是必交考卷，再拖下去将会更加被动。

再次，融入世界的世界体系观念，不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理性，也是一种全球史的文明观念。它不仅意味着与世界的和平共处，而且，面对世界高阶文明，须有择善而从的胸襟气度，借由文明由高向低的自然流向来充实提撕自身，并于渐臻佳境后输出反哺。此非惟近世历史所揭示，实为“自古以来”文明作育的一般性。回首三波改革开放，均为循此思路而来，而善莫大焉。诚然，刻下的国际社会依旧是一个自助体，所谓的世界体系交织着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只能以文野

之别、价值判别和利益趋归这三大认识为主轴，确定主次轻重，划分中心与边缘，以明确中国的自我定位，而首先和绝对的标准乃是文野之别。其实，就晚近这波“改革开放”而言，内政上不过是向世俗人生的生存常识回归，放弃“人为”辩证法的蛊惑，国际政治层面则为对于普世人类正道的低头致意。也就因此，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可谓不高尚，但却必须以基于文野之别的“人类价值共同体”作前提，为内核，定皈依。否则，方向、目的和准则迥异，何来同甘苦共命运，谁跟你共同一体？

正是在此，今日中美两国均表现出各自的双重人格。美国对内奉行洛克主义，行公民之道，“人待人如上帝”，意味着绝不能诉诸战争与革命，因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战争，都离不开暴力，一旦动武，就意味着政治无效，政治与共同体一同被放逐。而对外则毫不掩饰霍布斯主义，凭霸权之力，“人待

人如豺狼”，就在于“城墙之外无政治”这一希腊传统，至老美这儿发育蹈扬为“政治止于水边”这一政治定义，而厉行敌我之别。因而，美国的问题在于必须学会律己宽人，将“国家性”贯通于“世界性”，而对政治统一体进行软化，对于国际关系的自助体系性质善予中和。另一方面，就当今国朝而言，于世界论坛倡言命运共同体，强调法治与平等，自由贸易与人权保障亦且朗朗上口，而对内却钳口屏声，压根儿不承认政治乃合众群居的和平哲学，因而必须以分享公共权力的方式缔造自由、方能邦国永固这一立国之道，根子在于这个政权厉行专政，而与民主自由为敌，将亿万人民当作党国的人质。如此反差，如同笔者将于本系列第三篇论文“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中所言，它造成了“连自己的国民也不善待，还能指望它善待世界吗？”这一彻底的尴尬。

中国必须明了，超级大国没有纯

粹内政，鉴于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和幅员，虽非超级大国，却具有全球影响力，也同样丧失了纯粹内政的可能性。

最后，中国必须明了，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鉴于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和幅员，虽非超级大国，却具有全球影响力，也同样丧失了纯粹内政的可能性。在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和全球政治三重视野着眼，凡此大国兼具全球影响力，其内政治理具有全球示范性，由此造成了内政的国际化，反而致令主权受损，实为大国的必要代价。如阿甘本所论，这一悖论源自世界警察与主权者的关系，就是说，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并非世界警察，因而，不仅无权宣布例外状态，特别是根本没有借机将自己当作例外状态本身这一主权，而且，因其特殊位格，其主权行使反而失去了纯粹内政性。既然大国的任何一项内政举措，均不免深度牵连他国，搅动国际风云，因而，均不得不考量其外溢效应，也无法以“内政”和“不得

干涉内政”自我辩解。时至今日，隔洋相望，中美各有困境，而似乎都忘了大国位格及其悖论对于自己的要求。以此为戒，则中国不能深陷过去的革命话语和第三世界反抗者的角色，继续沿用以应对当今世界，而需明白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格，锤炼出坦荡从容的国家理性，有理讲理，依法论法，借力打力。但是，这一切取决于全民意志及其立法者表达，而不能仅仅出乎党派立场，更非定夺于内廷私议，恰须于权变之间，当变则变，该守才守。至于标准厘定，分寸拿捏，则牵涉到下列论题。

五、「该不该」与「能不能」，必须交由全民讨论

「庆祝大会」定调，「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笔者对此深表赞同。此间正需展现政治的决断性质，而事关历史进程

与亿万国民福祉，并必将牵动五洲风云。惟须补充说明的是，正因为事关国族命运和小民身家，则何为「该与不该」，怎样才算「能还是不能」，就绝非一党一派说了算，更非独操于宫闱政治暗箱作业之手。相反，必须诉诸公共理性，经由全民讨论，凝聚全民意志，进而登堂入室，锤炼而成国族意志，这才有望万众一心往前奔。这是守法者就是立法者、人民才是主权者这一共和国立国之道的基础规范，也是其基本伦理。否则，以此「庆祝」四十年，借此向亿万国民摊牌，划定底线，等于是在恫吓天下，非惟「庆祝」，毋宁，是在为五年前就已终止的「改革开放」补办葬礼，直接羞辱全民心智和心志，不仅否决了人民的主权者与立法者位格，从而等于承认此为僭主政制，而且，于造成逆流而动的大众印象之际，锁闭了一切对话窗口，也就等于是在自寻绝路。

何为「该与不该」，怎样才算「能还

是不能」，就绝非一党一派说了算，更非独操于宫闱政治暗箱作业之手。

还有，「该与不该」、「能还是不能」的标准——姑且不论所谓「能」者是指「可能性」之有无多寡，还是指「能力」之有无高下——不是别的，就是法治秩序之内，自由平等的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亿万人安宁生计、保有私产与心灵自主、免于冻馁和恐惧的自由。至于什么主义或者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等等，其本身并非目的，乃为手段，悉以实现上述目的为取舍标准。否则，要这个「国家治理」以及劳烦亿万纳税人天天流血流汗供养的国家本身，更不用说什么主义，这些个劳什子，干吗?!再说了，倘若所谓「不能」是指「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则羞辱之际，等于开启了忤逆全民意志的一场内战之门，背离了政治乃合众群居的和平哲学这一真义，真正危乎殆哉。

是的，年中高官曾经放言，年底中央将会「放大招」，出台更多「超出意

料」的「改革开放」利好政策。言犹在耳，万众翘首以待，不料时限既到，善良心愿等来的虽非晴天霹雳，却是一盆冷水，则期望必将转为失望，而于信心崩盘之际彻底绝望。实际上，最后的一点期待与期盼，连同那叫做信心的心气儿，已于今日随「一锤定音」而烟消云散。置此时节，合作意愿既失，则剩下来的唯有更加离心离德，乃至于对抗政治登场，三十多年里好不容易渐次培育的和平、理性与中道的改革路径及其共识遂将不复存在，实则意味着全体国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底线荡然，一切危殆矣。故而，「超越改革开放」的呼声必将渐起，虽压抑而难钳矣。

接续本节起始的意思，笔者在此预先发言，想说的是，「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普世道路，围绕着「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展开，是吾国自求多福的惟一大道。否则，沉湎于万年党国专政幻梦，而且，如笔者下篇文字所

述，乃至造成了中国渐为奠立于「大数据极权主义」基础之上的「红色帝国」这一国际印象，招致四面为敌，只能是绝路一条。

沉湎于万年党国专政幻梦，乃至造成了中国渐为奠立于「大数据极权主义」基础之上的「红色帝国」这一国际印象，招致四面为敌，只能是绝路一条。

四十年前曾有「真理标准」讨论，开启一线生路。今日再遭「该不该」与「能不能」之问，则当轴可有雅量，先就此网开一面，让亿万国民当一回家，做一回主，七嘴八舌先议议，然后再说「改不改」及其「该不该」与「能不能」。而国中贤达，峨冠博带，明眸皓齿，为家国天下计，尚欲踊跃置喙，以险中求存、危中生机，力免徒使后人复哀后人耶？

处士横议，说了未必白说，白说还是要说。否则，一个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将会降临华夏——不，是正在降临

并已经降临，则大家一起遭难，玩完儿，夫复何言！

2018年12月18-20日 定稿于清华
无斋

“哪有先生不说话?!”

身役教书匠，如八十多年前胡适之先生所言，哪能不说话！而说话就得让人听见，才能构成对话与交谈，让我们获得公共存在，保持人性。

在经管学院为EMBA学员上课。他们搜索百度，希望多了解授课教师，阅读与课程相关的教师著述。跟十来年前相比，今天学员年龄多在四十上下，男女搭配，精力充沛，尚存求知问道的热情。据好友郭丹清教授（Donald Clarke）相告，时惟2018年7月29日，我在百度上的词条从数十万被删到仅剩十条，算是悉数除祛。迄而至今，三月已过，犹有二三十条，羞羞答答，多为新闻报道，而牵连在下名字而已。如此，自然搜索不到任何信息。

揣摩原因，当是缘于今年七月下旬，我撰写《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为当下计，作千岁忧。情非得已，

情见乎辞，而终究仿佛情见势屈。我对此心知肚明，对于可能的横逆也早有心理准备，故而对于删除词条、屏蔽姓名一类的“和风细雨”，根本不曾留意，更不会往心里去。秦制妙法，新贵旧招，虽两千年往矣，前后有别，却了无进步，总不外钳口二字，何足为奇。

经学员提醒，遂查百度，发现凡近年落马的高官伶优，如周永康、薄熙来、鲁炜与“王林大师”等三教九流，均有数万词条。所谓的“四人帮”，万恶的四人帮，更是词连山海，条接云天，多到数不过来。它们林林总总，虚虚实实，多少给予读者拼联历史真相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关他们的词条内容，从不同视角，讨伐抑或崇仰，展示了酷烈时代的灵魂扭曲和体制罪恶，等于在向亿万读者时时提示历史的吊诡与无情，从而也就是在为避免悲剧重演，于涓滴汇流中积攒抵抗的精神资源。不只是抵抗某一种专断，而是对于一切专断的提防与抵抗。今昔

流连之际，孤单的个体理性方始可能串联并合成公共理性，于烛照人性中遵守常识，特别是明了人性的脆弱与幽暗，而护持我们生息其间、须臾不可离易的人世家园。而且，此非仅只惠及汉语读者，而实具普世意义，但首先沾溉汉语世界，自是不言自明，则网开一面，流水不腐，吾族吾民，生机活现也。

其中关于“四人帮”的一个词条，重述当年中共的表述，指斥其犯行“祸国殃民”，而罪恶“罄竹难书”，令我不禁回想起少年时代的觥觥岁月，以及后来审判大戏登场时的万众屏息，悲喜交加，更加珍惜此刻这个不搞“一浪高过一浪”阶级斗争运动的喘息时光。

他们“祸国殃民”，进至于“罄竹难书”，尚有数万词条展示其生平，罗列其行止，甚至刊布其作品。在下一介教书匠，三十多年里，但求温饱，“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何至于将我从网上抹掉，或者，似乎认为如此这般就能将我从人间蒸发。

唯一的解释是，我这个底层教书匠，不嗜打架，也不会任何一件兵器，竟然比“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还坏。

秘书写稿子，官员念稿子。有一个笑话说的是，讲话稿的页末一句是个疑问句，因排版原因，语助词连同疑问号“么？”印在了下一页。这位官员念完这句，环视台下，少顷，庄重翻页，再补充上语助词，音调铿锵，致使现场效果成了“周永康/吴永康/郑永康/王永康/司马永康不是一个坏人@ # \$ % &么？”转借此例，在下接续而来的造句作业是：“我比‘四人帮’还坏@ # \$ % &么？”

只是值此八面来风时节，欲令天下无声，惟剩诺诺，何其愚妄，何其滑稽。毕竟，身役教书匠，如八十多年前适之先生所言：“哪有先生不说话?!”而说话就得让人听见，才能构成对话与交谈，让我们摆脱孤立的私性状态，获得公共存在，保持人性。进而，我们的公共存在状态，也唯有这种公共存

在状态，才赋予我们以自由。职是之故，对于网络上的封杀，对于造成我们无奈只能用百度而无所选择的那个巨灵，岂能不留意?! 又岂能不往心里去?!

因而，对于助纣为虐而下手删除、屏蔽信息的，特别是做出类此决策下达指令的，我并无仇恨，只有满腔的同情! 再说了，年纪轻轻，身怀长技，为何不另找一个干净营生?

我们同处幽冥之中，不见熹微，唯以同情援手，手牵手，才能穿过这重重关隘而获救。

暮云朝雨，琴剑匆匆，秋意烂漫，千江一瓢，朋友，人间是多么的美好。

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尔纳克

豕鼠交替之际，九衢首疫，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公权进退失据，致使小民遭殃，疫病散布全球，中国渐成世界孤岛。此前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至此几乎毁于一旦，一巴掌把中国尤其是它的国家治理打回前现代状态。而断路封门，夹杂着不断发生的野蛮人道灾难，迹近中世纪。原因则在于当轴上下，起则钳口而瞒骗，继则诿责却邀功，眼睁睁错过防治窗口。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

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腐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至此，人祸之灾，于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一场全面战争。再说一遍，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老美或有打击中国经济之思，不料当轴急先锋也。尤其是疫疠猖獗当口，所谓“亲自”云云，心口不一，无耻之尤，更令国人愤慨，民心丧尽。

是的，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至此，放眼世界体系，揆诸全球政治周期，综理戊戌以来的国情进展，概略下述九项，兹此敬呈国人。

首先，政治败坏，政体德性罄尽。保家业、坐江山，构成了这一政体及其层峰思维的核心，开口闭口的“人民群众”不过是搜刮的税收单位，数目字管理下的维稳对象和“必要代价”，供养

着继续这个极权政体的大小无数蝗虫。公权上下隐瞒疫情，一再延宕，只为了那个围绕着“核心”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说明心中根本就无生民无辜、而人命关天之理念，亦无全球体系中休戚相关之概念。待到事发，既丢人现眼，更天良丧尽，遭殃的是小民百姓。权力核心仍在，而低效与乱象并生，尤其是网警效命恶政，动如鹰犬，加班加点封锁信息，而信息不胫而走，说明特务政治临朝，国安委变成最具强力部门，虽无以复加，却已然前现代，有用复无用矣。其实，老祖宗早已明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哪怕网信办再有能耐，也对付不了十四万万张嘴，古人岂余欺哉！盖因一切围绕江山打转，自以为权力无所不能，沉迷于所谓“领袖”之自欺，而终究欺瞒不住。大疫当前，却又毫无领袖德识，捉襟见肘，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却还在那里空喊政治口号，这个那个，煞有介事，令国人齿冷，让万方见笑。此亦非他，乃政体之“道德性败坏”也。若说七十

年里连绵灾难早已晓喻万众极权之恶，则此番大疫，更将此昭显无遗。惟盼吾族亿万同胞，老少爷们，长记性，少奴性，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为极权殉葬。否则，韭菜们，永难得救。

其次，僭主政治下，政制溃败，三十多年的技术官僚体系终结。曾几何时，在道德动机和利益动机双重驱动下，一大批技术官僚型干才上阵，而终究形成了一种虽不理想、弊端重重、但却于特定时段顶事儿的技术官僚体系。其间一大原因，就在于挂钩于职位升迁的政绩追求，激发了贫寒子弟入第后的献身冲动。至于乘势而上的红二们，从来尸位素餐，酒囊饭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此不论。可惜，随着最近几年的不断整肃，红色江山老调重弹，只用听话的，自家的，其结果，技术官僚体系的德性与干才，其基于政绩升迁的那点儿冲动，不知不觉，乃消失殆尽。尤其是所谓“红色基因”的自家

人判准及其圈定，让天下寒心而灰心，进而，离德离心。于是，这便出现了官场上普遍平庸而萎顿委琐之态。鄂省乱象，群魔乱舞，不过一隅，其实省省如此，举朝如此矣。其间原因，就在于这个后领袖时代，领袖制本身就在摧毁治理结构，口言现代治理却使整个国家治理陷入无结构性之窘境。此间症状，正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君不见，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瞑朦，治国无道，为政无方，却弄权有术，遂举国遭罪。百官无所适从，善者只堪支应，想做事而不敢做事，恶者混水摸鱼，不做事却还搅事，甚而火中取栗，遂劣胜优汰，一团乱象矣。

再次，内政治理全面隳颓。由此急转直下，遂表现为下述两方面。一方面，经济下滑已成定势，今年势必雪上加霜，为“风波”以来所未有，将“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推展至极。至于举国信心下跌、产权恐惧、政学愤懑、社会萎缩、文化出版萧条，惟剩狗

屁红歌红剧，以及无耻文痞歌功颂德之肉麻兮兮，早成事实。而最为扼腕之处，则为对于港台形势之误判，尤其是拒不兑现基本法的普选承诺，着着臭棋，致使政治公信力跌至谷底，导致中国最为富庶文明之地的民众之离心离德，令世界看清这一政体的无赖嘴脸。那边厢，中美关系失序，而基于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的定律，这是关乎国运之荦荦大端。恰恰在此，当轴颞颥，再加上碰到个大洋国的特没谱，遂一塌糊涂。网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想做而没做成的事，却让他做成了，岂只调侃，而实锥心疼痛也哉。另一方面，几年来公权加紧限制与摧毁社会发育，钳口日甚，导致社会预警机制疲弱乃至丧失，遇有大疫，便从封口而封城，死心复死人矣。因而，不难理解的是，与此相伴而来的，便是政治市侩主义与庸俗实用主义蔓延政治，无以复加，表明作为特殊时段的特殊现象登场的“知青政治”，早已德识俱亡。可以说，上上下下，他们是四十年

来最为不堪的一届领导。因而，此时此刻，兑现《宪法》第35条，解除报禁，解除对于网络的特务式管控，实现公民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坐实公民游行示威和包括结社在内的各项自组织权利，尊重全体国民的普遍人权，特别是政治普选的权利，而且，对于病毒的来源、隐瞒疫情的责任人及其体制性根源，启动独立追责机制，才是“战后重建”之大道，也是当务之急也。

复次，内廷政治登场。几年来的集权行动，党政一体之加剧，特别是以党代政，如前所述，几乎将官僚体制瘫痪。动机既靡，尾大不掉，遂以纪检监察为鞭，抽打这个机体卖命，继续其等因奉此，逶迤着拖下去。而因言论自由和现代文官体制阙如，更无所谓“国王忠诚的反对者”在场，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约，复以国安委一统辖制下更为严厉之铁腕统领，最后层层归属，上统于一人。而一人肉身凡胎，不敷其用，党国体制下又无分权制衡体制来分责

合力，遂聚亲信合议。于是，内廷生焉。说句大白话，就是“集体领导”分解为“九龙治水”式寡头政制失效、相权衰落之际，领袖之小圈子成为“国中之国”，一个类似于老美感喟的隐形结构。揆诸既往，“1949政体”常态之下，官僚体系负责行政，纵使毛时代亦且容忍周相一亩三分地。“革委会”与“人保组”之出现，打散这一结构，终至不可维持。晚近四十年里，多数时候“君相”大致平衡，党政一体而借行政落实党旨。只是到了这几年，方始出现这一最为封闭无能、阴鸷森森之内廷政治，而彻底堵塞了重建常态政治之可能性也。一旦进路闭锁，彼此皆无退路，则形势紧绷，大家都做不了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情形恶化，终至不可收拾之境。置此情形下，经济社会早已遭受重创，风雨飘摇于世俗化进程中的伦理社会不堪托付，市民社会羸弱兮兮，公民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至于最高境界的政治社会连个影子都没有，则一旦风吹草动，大灾来临，自救无力，他救受阻，必致

祸殃。此番江夏之乱，现象在下，而根子在上，在于这个孜孜于“保江山，坐江山”，而非立足于人民主权、“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的体制本身。结果，其情其形，恰如网议之“集中力量办大事”，顿时变成了“集中力量惹大事”。江夏大疫，再次佐证而已矣。

第五，以“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治国驭民。过往三十多年，在底色不变的前提下，官方意识形态口径经历了从“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和“四化”的富强追求，到“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再至“新时代”云云的第次转折。就其品质而言，总体趋势是先升后降，到达“三个代表”抛物线顶端后一路下走，直至走到此刻一意赤裸裸“保江山”的“大数据极权主义”。相应的，看似自毛式极权向威权过渡的趋势，在“奥运”后亦且止住，而反转向毛氏极权回归，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为甚。因其动用奠立于无度财政汲取的科技手段，这便形成

了“1984”式“大数据极权主义”。缘此而来，其“微信恐怖主义”直接针对亿万国民，用纳税人的血汗豢养着海量网警，监控国民的一言一行，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而动辄停号封号，大面积封群，甚至动用治安武力，导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审查之际，为可能降临的莫名处罚担忧。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讨论的思想生机，也扼杀了原本应当存在的社会传播与预警机制。由此，“基于法西斯主义的军功僭主政治”渐次成型，却又日益表现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其非结构性与解结构性。职是之故，不难理解，面对大疫，无所不能的极权统治在赳赳君临一切的同时，恰恰于国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见肘，制造大国一时间口罩难求。那江夏城内，鄂省全境，至今尚有无数未曾收治、求医无门、辗转哀嚎的患者，还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丧黄泉者，将此无所不能与一无所能，暴露得淋漓尽致。盖因排除社会与民间，斩断一切信息来源，只允许

党媒宣传，这个国家永远是跛脚巨人，如果确为巨人的话。

第六，底牌亮出，锁闭一切改良的可能性。换言之，所谓的“改革开放”死翘翘了。从2018年底之“该改的”、“不该改的”与“坚决不改”云云，至去秋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之诸般宣示，可得断言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波“改革开放”，终于寿终正寝。其实，这一死亡过程至少起自六年前，只不过至此算是明示无误而已。回头一望，二十世纪全球史上，但凡右翼极权政治，迫于压力，皆有自我转型的可能性，而无需诉诸大规模流血。纵便是“苏东波”，尤其是东欧共产诸国等红色极权政体，居然亦且和平过渡，令人诧异而欣慰。但吾国刻下，当局既将路径锁闭，则和平过渡是否可能，顿成疑问。若果如此，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夫复何言！但愿此番大疫过后，全民反省，举国自觉，看看尚能重启“第四波改革开放”否！？

第七，由此顺流直下，中国再度孤立于世界体系，已成定局。百多年里，对于这个起自近代地中海文明、盛极于大西洋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上演了多场“抗拒”与“顺从”的拉锯战，反反复复，跌跌撞撞。晚近三十多年里，痛定思痛，“低头致意”以及“迎头赶上”，乃至“别开生面”，蔚为主流。惜乎近年再度犯二，犯横，表明“改开”走到头了，左翼极权“退无可退”，无法于和平过渡中完成自我转型，因而，也就怪异于现代世界体系。虽则如此，总体而言，几番拉锯下来，中国以其浩瀚体量与开放性态度，终于再度跻身现代世界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重要博弈者，重新诠释着所谓“中心—边缘”的地缘叙事，也是事实。但是，与国力和时势不相匹配、太过张扬的外向型国策，尤其是内政回头，日益“法西斯化”，引发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博弈者对于红色帝国崛起的戒慎戒惧，导致在高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却为共同体所实际拒斥的悲剧，而日呈孤

立之势，更是眼面前的事实。事情很复杂而道理却很简单，一个不能善待自己国民的政权，怎能善待世界；一个不肯融入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的国族，你让人怎么跟你共同体嘛！故尔，经济层面的交通互存还将继续存在，而文明共同体意义上的孤立却已成事实。此非文化战争，亦非通常所谓“文明冲突”一词所能打发，更非迄今一时间数十个国家对中国实施旅行禁限，以及世界范围的厌华、拒华与贬华氛围之悄悄潮涨这么简单。——在此可得提示者，隐蔽的“黄祸”意识势必顺势冒头，而买单承受歧视与隔离之痛的只会是我华族同胞，而非权贵——毋宁，关乎对于历经磨难方始凝练而成的现代世界普世价值的顺逆从违，而牵扯到置身列国体系的条约秩序之中，吾国吾族如何生存的生命意志及其国族哲学，其取舍，其从违。在此，顺昌逆亡，则所谓孤立者，全球现代政治文明版图上之形单影只、孤家寡人也。扭转这一局面，重建负责任大国形象，担负起应担

之责，而首先自良善内政起始，必然且只能皈依人类普世文明大道，特别是要坐实“主权在民”这一立国之本。在此，内政，还是内政，一种“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善政体及其有效治理，才是摆脱孤立、自立于世界体系的大经大法，而为国族生存与昌盛之康庄大道也。那时节，顺时应势，中国加入G7而成G8，亦且并非不可想象者也。

第八，人民已不再恐惧。而说一千道一万，就在于生计多艰、历经忧患的亿万民众，多少年里被折腾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我们人民”，早已不再相信权力的神话，更不会将好不容易获得的那一丝丝市民自由与三餐温饱的底线生计，俯首帖耳地交还给僭主政制，任凭他们生杀予夺。毋宁，尤其是经此大疫，人民怒了，不干了。他们目睹了欺瞒疫情不顾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他们身受着为了歌舞升平而视民众为刍狗的深重代价，他们更亲历了无数生命在分分钟倒下，却还在封

号钳口、开发感动、歌功颂德的无耻荒唐。一句话，“我不相信”，老子不干了。若说人心看不见摸不着，最最无用，似乎经验世界早已对此佐证再三，也不无道理。这不，万民皆曰可杀，他却坐享天年，如那个人人唾骂之李大鸟者，令人感慨天不长眼，天道不公，可实际上，天是苦难本身，与我们一同受罪。但是，假如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人胸腔里跳动着一颗人心，而非狼心狗肺，其因生老病死而悲欣交集，其因祸福义利而恨爱交加，其因落花而落泪、流水而伤怀，则人心所向，披荆斩棘，摧枯拉朽矣！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至于脑残与岁月静好婊们，一群乌合之众，历史从来不是他们抒写的，更不因他们而改变奔流的航道，同样证之于史，不予欺也。

第九，败象已现，倒计时开始，立宪时刻将至。戊戌修宪，开启邪恶之门，集权登顶之际，恰恰是情势反转之时。自此一路狂奔倒退，终至败象连

连。撇开人心已丧不论，则前文叙及之港台应对失策与中美关系失序，以及经济下滑之不可遏止、全球孤立，表明治理失败，违忤现代政治常识的强人政治事与愿违。大家面对闷局而恐惧其已成僵局，苦思焦虑其开局与再布局，期期于内部生变式与自下而上式之破局犹如水中捞月之时，港台形势发展实已自边缘捅破铁桶，而开辟出一线生机。此种自边缘破局、而渐进于中心的和平过渡之道，或许，将成为中国式大转型的收束进路。此时，吾友所说之“难城”，或为华夏旧邦新命之耶路撒冷。换言之，边缘突破意味着现代中国的立宪时刻再度即将降临。当此关口，天欲晓，将明未明，强权抱残守缺，不肯服膺民意，则崇高之门既已打开，可得预言者，必有大量身影倒毙于黎明前矣。

以上九点，呈诸国民，均为常识。而一再申说，就在于国家治理未入常态政治轨道，国族政治文明有待现代

转型，而于积善前行中，期期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收束这波已然延续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正是在此，我们，“我们人民”，岂能“猪一般的苟且，狗一样的奴媚，蛆虫似的卑污”？！

行文至此，回瞰身后，戊戌以来，在下因言获罪，降级停职，留校察看，行止困限。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罚降身，抑或竟为笔者此生最后一文，亦未可知。但大疫当前，前有沟壑，则言责在身，不可推诿，无所逃遁。否则，不如杀猪卖肉。是的，义愤，如西哲所言，正是义愤，惟义与愤所在，惟吾土先贤揭橥之仁与义这一“人心人路”之激荡，令书斋学者成为知识分子，直至把性命搭进去。毕竟，自由，一种超验存在和行动指归，一种最具神性的世界现象，是人之为人的禀赋，华夏儿女不能例外。而世界精神，那个地上的神，不是别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绚烂展开。如此，朋友，我的亿万同胞，纵然火湖在前，何所惧哉！

脚下的这片大地啊，你深情而寡恩，少福却多难。你一点点耗尽我们的耐心，你一寸寸斫丧我们的尊严。我不知道该诅咒你，还是必须礼赞你，但我知道，我分明痛切地知道，一提起你，我就止不住泪溢双眼，心揪得痛。是啊，是啊，如诗人所咏，“我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因而，书生无用，一声长叹，只能执笔为剑，讨公道，求正义。置此大疫，睹此乱象，愿我同胞，十四万万兄弟姐妹，我们这些永远无法逃离这片大地的亿万生民，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齐齐用力、用心、用命，拥抱那终将降临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阳！

庚子正月初四初稿，初九定稿，窗外突降大雪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

要把我的歌兒唱完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泣

——【苏联】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转引自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冬去春来，举世皆疫，死伤枕籍，人间停摆。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性隔离，一种”人类的消失”与”世界的陨落”景象，其所撬动的潜藏已久、伺机而动的文明论疏离与种族论敌意，特别是它将政治的原始本质情境性地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权秩序的颓然衰落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初露端倪，伴随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觉醒与意

识形态复苏，正在进一步逼迫着我们反思人间秩序的政治涵义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并重述古老的政体之辩。由此，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

置此情形，全球厌华效应第次发酵，对于共产极权体制终于重生应有之政治警觉，而中国的国家信誉扫地，中国之为一个政治单元再度空前孤立于世界体系，民生国运乃双双危殆矣。——几年来内政外交的持续倒退，尤其是内政之向毛氏恶政暗黑深渊倒行逆施，卯足劲儿作呀作，早已引致广泛不满与普遍危机，而终究将必须建设中华文明宪政秩序方能建成现代中国这一现代立国的普世原典问题，再度进一步鲜明呈现于国人面前。换言之，这个世界于可见未来，中国则值此当下，究竟将会迎来与应当具有何种政治方式与生活方式，轰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关头矣。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殒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熹微，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

大疫以来，历经前期钳口锁喉、欺瞒作伪，后期一刀切全权维稳式举国发动，以万户萧疏、人人禁足为代价，国朝战疫已见成效，甚为显然。但因信息屏蔽，唯上是从，决策过程藏于宫闱，社会监督阙如，下层官员战战兢兢束手束脚，则后续效果难料，必有反复，同样难出意外。在此，监控型国家自上而下层层辖制，公权几乎不受限制，国民慑于恐惧而惯于听话服从，一日，列宁式政党的政制效能凸显，本不足奇。如本文后续所论，政治关乎良政，政制则唯善治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现为效能，而效能在于瞬间令

万民禁足。刻下日常所谓”国家治理”云云，其实通常就是在抽离了良政这一基础之后，于此层面擘画。而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机时刻警察监控型体制的拿手好戏。看看朝鲜，闭关锁国，人人站得笔直，更且一目了然。

相对而言，立宪民主政体赋权有限，社会发达而政府公权多所收敛，进入战时状态的程序性条件苛刻，决策机制启动有待于协商政治赋能，短时间内可能反不若威权政体之雷厉风行。倘若遇到川建国式领导及其极化党争，心有旁骛、懈怠疏忽却又自以为是，则立宪民主体制优势尽失，却又无威权体制的战时效能，则情形势必一塌糊涂。实际上，整个欧美此番预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为”黄种人问题”这一隐秘内心的文明论默认。此于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国财长峰会上的遭遇可证。相较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中国并非失败型国家，架构于此国家之上的威权

政制，凭借此种国家能力之无度财政汲取，喂养强大安保力量以为后盾，用国安纪检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强悍，加上这几十年人民血汗充实了国库，则战时机制一旦发动，短期效应突出。比诸今日之左翼极权，旧日老蒋统治蔚为右翼威权，而“国家治理”捉襟见肘，就在于其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初奠，只是个挂一漏万、摇摇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经济甫开其头，财力人力均不敷利用，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节翌日一纸封城，顿时举国禁足，考绩体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这边厢，百姓诺诺，源于一个“怕”字。不仅恐疫，更且惧官，连一瞬间仿佛获得执法权、权威加身的小区物业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祸也。祸者，不仅是疫，更且为罚，一种极具任意性的、随时可能加诸身心的强制。实际上，也确曾普遍发生了安保村干过度”

执法”实例。君不见，当此之际，多少行政举措说来就来，运动式，无所谓法制不法制矣。至于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学差异而导致生命政治态度有别，进而波及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亦且甚为显明，后文还将有所论及。网议以民众「怕死」与否解释中西国民面临疫症时对于常态社会性生活之趋避，可作侃大山一乐，却当不得真的。都怕事，都怕死，只不过外在体制及其释放的信息不同，导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与指向有别，以至于民情之万里不同风也。至于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却娇然”我们相信政府”的大妈们，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痴儿，连”奶头乐”们都不如，不足论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布疫情，国朝上下乃娴熟运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难政治，营造拯救政治，最终烘云托月般炮制出领袖政治这一神话。封城之后全民恐慌，于是全面收紧行止，恐慌因信息有限而发

展成普遍恐惧。因恐惧而愈发依赖公权，只能服从，更加服从，后者乃于仿佛承担无限责任之际，予取予夺，万民俯首帖耳矣。国家和人民，就这样活生生惨遭绑架，而党国独大哉。其实，此番大疫，逝者已矣，伤者自舔，举国百姓克制自奉，万户萧瑟，承受了最大牺牲。如此这般，官宣对于实际疫情消长及其碾压之下患者长街求医的惶然窘迫情形之屏蔽，对于医护仁心智勇的选择性报道之引向电视荧屏前的开发感动，对于所谓“火线入党、院士领头宣誓”的赫然镜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后来有关欧美应对失措之沾沾自喜、喋喋不休大幅报道，凡此信息披露之选择及其指向，悉数利用苦难，旨在维护永远无错的光辉形象，塑造这艘烂船从来踏波前行、力挽狂澜的神话，引向“万众一心、同赴国难”的公共诉求，以及追随领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论是谁造成了“国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如此之多的“国难”。虽说一厢情愿，可笑荒唐，但经此辗转，不仅

一定程度上似乎于普罗大众感官层面成功将丧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将作孽者变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祸、文过饰非的恶棍，摇身一变而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进而，仿佛一时间消泯了对于天灾人祸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就此斩断了最高政治责任的因果链条。逮至疫情稍缓，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两头，悉数希望尽快做一了结，以告别这生命不堪承担之重。至于痛定思痛，追根究源，仅限于推导至大疫首发地之中低层级“官僚主义”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来，匆匆交卷，等于忘记了背面还有考题，实有待后续逐步加上补丁，不遑稍懈。但无法究源追责，等于埋下祸根，一旦因缘际会，旧疾还将发作。十七年间，中国两度爆发疫疠，波及东亚与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后实际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赞歌”，叫嚣“战胜”，厚颜若此，死护着面子而其

实颜面尽失，均属一种后文还将论及的极权政治路径依赖，教训在此，令人浩叹。

这样，自始至终，伴随着钳口锁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紧锣密鼓。实际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喷流之际，已有红彤彤《大国大潮》刊行，令国人齿冷心寒。此后更有颂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领袖光辉。无耻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范而指向“领袖型人物”结论，撒癔症，以此投名，为此张本。凡此颠倒黑白，虽说不出意料，却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为令人恶心。——那些央视播音评论诸辈，年纪轻轻，面容姣好，嗓音优美，却心智懵懂，心志错乱，忸怩作态，为虎作伥，谎话连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厌恶！难怪此前其后爆出那么多男盗女娼。坊议所谓央视者，高官富贾之后宫也，概为忿语，而慨为一般舆论矣！

至于其间大小汉语施密特们，或搬用“例外论”，或炒作拉丁左派陈词

滥调，鹦鹉学舌，编写巨兽神话，操弄民族主义，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对抗，织造中西明暗强弱寓言，开发感动，利用”钟南山—张伯礼”式巧伪之徒维稳白手套，白脸红脸，牵引盲众，种种伎俩，狡黠险恶，而又愚蠢无比，超越戈培尔，羞煞塔斯社，气死张春桥，却终究纸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话下。至于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杀，把核弹挂在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间称其”搅屎棍”，更不论矣。——一场本应赋予国族以生聚教训的苦难，似乎竟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顺提一句，坊议辄谓”能爬到这个位置，说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此论看似审时度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追认式的成王败寇逻辑，唯权是从，逢王就跪。究其实，多数而言，”这两把刷子”要么依恃蓝色血液或者诸如”秘书”这类裙带关系，扶上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则行云流水，少爷作风

用于执政，百姓殃矣；要么凭借逢迎溜须、人前人后那一套，展现的恰恰是劣胜优汰，令不幸混迹官场挣一份口粮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边缘；要么按部就班混年资，或者，天上掉馅饼，整个儿一个糊里糊涂。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识增长停滞于学校毕业之日，心智与心志一边倒，唯一常习的便是官场文化，却因权位获得话语权，遂以发霉的旧货应对眼前的现实，除开绝对看上边眼色行事这一条牢记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却又仿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矣。——对什麼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知，愚妄可笑之至，却自上而下，层层上演，级级模仿。置此情形下，居然还好意思说”党政机关里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认知错位，自爱兮兮，令人作呕。

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

面对大疫，民族国家疆界及其地缘政治意义兀自凸显，立马取代跨国共同体，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以利己自保为最高准则。而且，其地理与法政意义超出文明论，也逸出政治意识形态。一国之内，亦以行政区划切割。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国国自保，断航禁行，无不沿边界展开——家门、村口、省市区划与国境。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区规模乃至国家层面抢夺拦截医护用品之丛林闹剧。换言之，国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间为生物政治所取代，国家间政治中的共同体概念面对“古老的”国家之强力地缘实存，即刻不攻自溃。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缩回国民，国民再被迫萎缩为市民，市民蜷缩成属地的居民，居民蜕化为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体到街区与门牌，竟至于绿码中的号码。真所谓画影图形，无所逃遁，

天网在上（under his eyes）。大国家、大政府阴影下，公民个体不仅无法逃离国家，而且随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讲述了一个政治不仅是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始准则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法政共同体权力而展开、本来意欲铺排之、却不意为其所操控之异常尴尬。就是说，作为治理单元、受托对象的国家，变成了”赤裸国家”，人民回归”赤裸生命”，而委责于国家及其政府。国家及其政府呢，不论表面上或者现实中，乃君临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处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这一地缘法政大框架中，仿佛坚不可摧的自由主义一己悲欢，已被大疫之下顿然现身之巨灵收拢于有形巨掌。威权国家本就无此政治底蕴，藉疫操练，驾轻就熟，无以复加，而人民从来都是”赤裸”的，立宪民主国家亦以”例外状态”应对，就其外溢效应而言，那历经沧桑的”民主国家阵营”

一经大疫击打，其实早已落叶纷批，各顾各，硕果仅存的不过是萎缩为军事情报分享机制的”五眼联盟”，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之上阵父子兵。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国家之同仇敌忾，也难觅民主国家之声气相求，而原因不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原始巨灵发力，现代国家的1.0版本（民族国家—文明立国）冲决了其2.0版本（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目标设置，而且，在于老美这个头号民主国家居然沦落为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国，了无头号大国应有的胸襟与担当，曾几何时的”美国时代”也就仿佛要进入”后美国时代”了。美欧等地民众不时上街抗议个人自由受限，公民联邦仿佛依旧发力，而民粹与民主夹杂，反智与反暴混融，此间源流堪为索引。进而，诸种因素辐辏，导致虽然大疫将一损俱损的现象摆在眼前，而下文将要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无论是在本意还是引申意义上，均顷刻土崩瓦解。

的确，大疫之下，奠立于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原形毕现，挥起了各扫门前雪的巨帚，高墙沿国境瞬间耸立，可堪讶异，却绝非意外也。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番应对大疫，北欧的瑞典和东亚的日韩新等国，中国的台湾地区，以色列与澳新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称典范，深值探究。香港这一原本治理优异之地，人财两丰，却失误连连，适为反例。当然，以色列常年处于战时或者准战时状态，其成功抗疫模式，难为其他常态国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仅具个案意义。——无论科技还是文化，此邦时常一骑绝尘，难以仿效矣。

就国朝情形而言，公权借此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救灾政治与治水社会的全副症状。但凡自上而下，级级发动，层层加码，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宁左勿右，压抑民间，取消社会，以及钳口噤声、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悉数上演，仿佛无所不能，却又

捉襟见肘。当然，无论怎样，”圣主英明，贪官有罪”这一条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头政策好，下头执行歪了”还是永不言败的制胜法宝。华生兄的长文滔滔，处心积虑，为君上忧，不过为此精致理论版本。其结果，如前所述，阻绝了究源追责的因果责任链条，是非难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灾人祸，一切照旧矣。非典而后新冠，居然接二连三爆发于崛起中的大国，一个确曾诚心希冀世界接纳的古老城邦，已然对此做出了最好帮助。——行文至此，媒体报道三鹿事件重演，人间又现大头娃娃，再度对此慨然作证，岂一个痛字所能道尽。不过，话说回头，其间堪值凝视而思考者，乃面对汹涌民意，公权于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剧转身，说明人民一旦觉醒而不再恐惧，齐齐勇敢发声，则威权铁桶已然并非滴水不漏。总体而言，凡此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表明这个国族基于立宪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现代治理，无论是菁英理念还是大众实践两端，均尚付缺如。应急性的

准战时状态收拢了本就薄弱至极的民权，在初期略见零星异议以后，音消响歇，而权力万能与领袖全能的群众心理，蔚为一般国民意识，直将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观念，扫荡无余。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场大疫，特别是它所暴露的一人至尊决策模式和以党为大的价值理念，不仅让精英阶层，也令一般民众恍然其良政不存的事实，惶然而恍然于公民面对撒谎成性的公权无所措手足、只能“它说啥就是啥”之无可奈何，更加明晰极权政治的威势及其致命弊害，而催生出对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善治不可遏止之渴求。”党国”之为恶的实存，已然不容于民情，遂再度昭告于天下。毕竟，从疫情初露至封城前夕，钳口欺瞒，展示的是一种地域主权体为所欲为的整全性权力意志，而终亦必对于整个人类常规生态之随时肆意蹂躏的现实性，预演的是一种末日审判式毁灭政治，已然向全体人类敲响了

警钟，而且，其实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否则，如诗人所咏，

被唤作正义的殿堂

一个土生土长的摩菲斯特穿着
列宁装

把奥罗拉的孙辈送往旷野

其间沉渣泛起、接连发生的一种骚操作，一种转移视线的有效手段，也是帝制王朝政治最为邪恶的御民之术，同样是一种极权政治面对危机时的路径依赖，就是”群众斗群众的全面内战”。此刻，它表现为围绕著作家方方女士作品的争论进至于批判展开了。收放之间，或为灾情压顶、封城闭户时之悲情出口，或为疫情稍缓、开城启户后的民粹靶点，用亦用矣，弃亦弃焉，全在背后那个邪恶文宣，而有汹汹盲众如臂使指，更有落井下石者之推波助澜。一俟”方方热”冷，不足以鼓噪盲众，可以预言，必有”圆圆热”或者”团团热”等文宣沙尘暴取而代之，再度

肆虐媒介，愚弄国民心智，荼毒国民心志。迄至本文杀青之时，背景深厚的盲众打头、而有官方文宣唆使的这出闹剧，正以”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方式，扫描锁定，定点清除般地指向一个个直言教授。高校党政动如爪牙，最为卑鄙，”立即启动调查程序”。这样，全面内战终于从”批作家”发展为”斗老师”。——朋友，”1966”的情形，已然卷土重来矣！可以预言，纵使侥幸不至于即刻发展成全面”斗批改”，然而，值此情境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从今往后，国朝高校必会更加死水一潭，所谓文化创造与中华文明复兴，从此不过梦呓，云乎哉！

本来，正常情形下，生命权和自由权之间的平衡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而终究诉诸法权，必需也必有一个唯一标准答案。恐慌政治的邪恶在于混淆其间区际，将公民政治驱逐，令个体成为赤裸裸的生物存在，让生物政治学凌驾于一切德性之上，从而，将作

为医学手段的社会性隔离悄悄转化为政治性禁制。由此，将头号生存优先权赋予党国本身，一切围绕着党国之万世一系打转。吾国情形若此，大洋彼岸头号大国，此刻仿佛同然，第一生存优先权居然是激化党争下的连任愿景，一切围绕着选情打转，以连任为最高考量，其目光短浅，胸无大局，肩无担当，唯剩气急败坏，谎话连连，实在对不住自家人民和这个伟大邦国，可谓政制失败与民粹主义川普式对美国追踪政之登峰造极，虽良政而乏善治矣。究其实，同样是一种路径依赖，展现了帝国意志萎靡后的文明腐朽与民主体制运行既久、需除积弊而暂时无解之无效自救也。

在此，饶有意味的是，中文世界有一种叙事，其引欧洲舆议，认可国朝处置“紧急状态”的“决断能力”，指认此非全然政治意义上的剥夺自由，毋宁，乃医疗意义上的紧急处置。在它看来，新冠君临天下之际，“决断”是国家权

力最为重要的能力。正是借此能力，国朝迅即摆脱大疫所致”失序”之”例外状态”，率先回归常态。如其所述，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就认为”例外状态”其实是一种正常状态，对此状态下的集权模式不应过分解读，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这种”战争状态”中的应急手段其实是正常状态，而此时国家也必须紧急出场，显示为”赤裸国家”，亦即兑现霍布斯所谓国家最为基本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职是之故，此刻的国家权力是”中立的”，面向所有人。否则，反致更大灾难。国内所谓新儒者同样佯论权力及其决断的必要性，赤裸裸表达权力膜拜，一副乞灵于权力之脏兮兮可怜样儿。可问题在于，他们似乎均揣着明白装糊涂，此于欧美，或为例外状态，因而需要政治决断，而于国朝，则为常态，一种日常全面专政状态，不过于此再度放大而已。一个并无个人自由与立宪民主以为基础，并借此予以对冲的所谓”决断”，其实是为所欲为，至多”维稳”而已矣！再者，

此集权非彼极权，政治决断亦绝非等同于”国家权力”实即政府权力之最为重要的能力，毋宁，后者乃为治理意义上的行政主导者。再说一句，行政执行力不等于政治决断力。诸如”封城”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行政决策，而非政治决断。决断是也从来都是政治的权能，只掌握在最高主权者手中。刻下国朝最高主权者缺位，人民以及作为它的个体行动状态的选民不见踪影，则论者误将党国之专权当作最高主权者之”最为重要的能力”，可谓昧矣，而巴迪欧们痴矣。至于说”尊重君子的儒家价值观”是”中国抗疫的文化密码”，面对千千万万惨遭整肃、葬身沟壑的华夏读书人，面对李文亮们，真不知汉学家作者如何自圆其说！？

三、文明小国

大疫来临，一下子折射出中国依旧是文明小国与精神竖儒的窘迫。首

先，现代政治文明阙如，致令政制难济政治困厄。人类的最高智慧是继续共同体和平共处的技艺，文明的最高成果在于确保其和平共处之良政，而它们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尤其是现代政治文明之善果也。笔者屡叙现代国家前后递升的两个版本，理述国家理性的三个层面，综论“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于建政立国之双元拱立的宪制意义，苦口婆心，情见乎辞，不外乎意在帮助，置身现代时段，拥有现代政治文明，以此立国，据此建政，按此行宪，照此办事，是建设文明大国的必修课业，而为文明昌盛之必有作业，也是现代公民之必需修业，终亦必造就良善生活之普遍福业。就国朝刻下情形而言，“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蔚为现代政治文明之荦荦大端，无法回避，总需登场。无此政治设置与政制安排，政府行政再有绩效，也难免政权危殆，更何况不可能继续永远的高速增长，而绩效从来都是有涨有落，所谓“大年”“小年”也。再者，增长后分红严重不均，

却无”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这一宪制安排善予纾缓，政治正义不存之地亦无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救济，凡此因素叠加，则危殆永存，恐慌成为政治常态，而恐怖遂成社会生态，恐惧乃深深内化为国民心态矣。相较而言，立宪民主诸国恒有政府危机，间或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甚至会生发文化危机，但却一旦奠立，从无政权危机，邦固而国安，原因就在于”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互为表里，进退两补，出处相应，上下撑持，唯一需要担心、不好好干活肯定就会滚蛋的是仅具周期合法性之政府也，受托组织政府而依法行政之政党及其政客也。吾国所缺，而他山之石，恰在于此矣。

正是此种宪政体系及其政治文明，开启了政治问责的公民之道，绝不承认无错政治，也不能容忍一个不会道歉的政府，虽说任何认错与道歉，同样需要公民去争取。认错政治与道歉

文化，堪为现代政治之政制层面的必有机制，也是此种政治之于政制的道德约束，而恰为全体公民和平共处之政治文明也。否则，体制上的无错政治与最高领导人的无谬神话猖獗，认错与道歉文化阙如，道义荡然，国民眼睁睁看着他们作恶却无招架之力，则是非混淆，人间必成匪帮。国朝今日山呼英明伟大，正陷于此壑，促令吾国所缺者，愈发显豁矣。朋友，想一想吧，十七年里，两度疫兴，此番更是播散全球，造成广泛而必持久之灾害，不论具体原因何在，吾国岂能不三省吾身，而躬自致歉。首先是向全体国民道歉谢罪，特别是向死伤同胞道歉谢罪，并追究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否则，违逆国家政治中的共和道义，有悖全球和平共处之处世之道，亦非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崛起大国所当为也。在此，切不可与今日美帝这届领导比烂，一个盛极而衰的晚期帝国治理，教训多于经验。特没谱天天自爱自夸，没羞没臊。就此而言，特没谱这位老兄祸国不

假，而良政早已奠基后如何续于精进，从而保有善治，同样为立宪民主政体必须朝夕怵惕者也。

再者，现代政治以文明与自由立国，意味着国家必须保有道义愿景，一切均当皈依公义，以追求公道为政道之正道，追求与捍卫人类永久和平。就此而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虽非高端远景，却为眼前目标，拿捏尚佳，有点儿现代政制目标的意思。倘能配合以坚实的政治德性，堪为响当当竞选口号呢。而关键所在，也是问题所在，在于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例如，为此首先需要让人说话，还我同胞以言论自由，屏拒那个恰相违忤、钳口噤声的书报检查体制，以及作为其源头的党国体制。——连话都不让人说，还幸福个鸟啊，怎么个复兴法子?! 在此，对于道德堕落的修复，不能走一贯”伟光正”的路子，其结果只会进一步混淆是非，戕害心灵。毋宁，严明是非，厘辨

对错，惩恶方可扬善也。就以李文亮事件之前后反转而论，其之迫于压力，操于权力，知错能改，虽说我羞答答，小修小改，却也算是善莫大焉。但于加诸其他同胞的迫害，同事同理，却依然固陋顽拒，则等于表明前者只是姿态，而非基于是非之服膺，后者才是本质，才是真意，而反差若此，无异于在用钢鞭抽打着中华文明与全体国人的道德神经矣。

“不宁唯是，那边厢，精心塑造、着力树立的”钟南山—张伯礼”式听话驯服的榜样，一种典型的懂得适时适度站台的伪君子，一种维辛斯基和李森科式人物，反被塑造成大众英雄与公民楷模，正说明此间错乱依旧，而德性坠矣，可堪蹉叹！——张伯礼者，蒙昧若此，居然抡起大棒打人，充当棍子，尤为不堪也。往大里说，包括钱学森们在内的纳粹科学家们，同在此列。尤有甚者，艰困当口，年轻一代外交官们及其莫洛托夫式表演，看似伶牙俐齿，实

则愚陋不堪，捍卫国族利益不足，而败坏中国形象有余，令人于惊诧而恶心之际，不禁忧心如焚。——不下狠心整顿这个专事交恶、进退失据、毫无章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外交部，国无宁日，复兴云乎哉。

也就因此，秉具健全的国族心智，蔚为文明大国必有之修业，也是所有文明类型理当修习之课业。大者，恢矣，弘也，而与所谓“岛国心态”或者“受伤文明”区别开来。以此观照，此番大疫以来，国朝上下依旧为历史创伤情结所缠绕，着实暴露出吾族心智之羸弱。一句所谓“病夫(sick man)常论就引发轩然，可以作证。早已成长为全球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不料，却依旧有着一颗极易受伤的玻璃心，要么正帮助吾国吾族依旧自信不足，有待理性洗礼，亟需文明澡雪。换言之，此非唯情结作祟，亦表明知识论之庸蔽。要么，就是恶用创伤记忆，有意撩拨盲众也。正是在此，一方面有意无意遗忘

痛史，尤其是眼前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又深陷”1840情结”而不能自拔，表明恶劣文宣多年洗脑，戕害我华夏国族心智深重。

由此，不难理解，这边厢，当其国中大疫暂缓，危机依旧，而全面、深刻与致命危机才刚刚开始，却不期然而有所然间，矫器之声纷起，民粹嗤外涛激，伴随着大小汉语施密特们的”例外”论调，肉麻颂歌震天，其结果，如诗人所叹，”他们日夜编写关于巨兽的神话，万千猛兽伺机在春天复活”；那边厢，环球疫的政治正酣，死伤日增，尸横山水，则痛定思痛，沉痛转化为积怨，积怨催化忿怒，忿怒引发政治，必随时日牵延而逐渐爆发，甚或势如火山喷薄，则声讨气气部门，政经齐伐，也是预料中事。反思既深，痛感疼痛，总须剑指。可以预言，以世卫组织和全球防疫为突破口，其必一浪高过一浪。当此之际，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朝民粹主义反智与民族主义仇外，两股

恶绪，交替发作，唯一烘托的是领袖英明万能的神话与政府救苦救难的佳话。与此相应，一个类似于犹太人千年阴谋的中国阴谋论在民粹层面若隐若现，已然浮现在美国红脖子们的街头口号中，而“集体猎巫”式阵势雏形初现，不能不引发关于启蒙的沉重话题。病夫治国，错乱荒唐，大洋两岸，如出一辙。——重申一句，文宣最为无耻，在在败坏华夏德性，而令举世嗤笑矣！

顺提一句，国朝情形，大学里的“工科师傅”是极权的天然帮凶。此与个体人品好坏才学高低无关，毋宁，涉及的是一种作为工作状态的生存状态。君不见，所谓的团队协作运行方式，听命于一个“老板”核心的组织方式，绝对遵奉定律而后善自运用的服从式思维逻辑，仰赖官方项目与找米下锅的生存状态，层层辖制、分包归拢的管理体制，以及绝对趋利避害的商业导向，特别是了无价值观的价值观与普遍毫无美感的美学状态，使得他们俯首帖

耳于绝对权力。而威权国家最为欣赏的就是这种头脑可能发达，而心肠近于麻木，却又惯于服从的”新人”。所谓”听话出活”者也。可惜，就建设正派人生、良善社会与惬意生活的现代文明国族而言，没有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蕴与科学理性，徒有工科技术，充其量不过一介二流国家，根基摇晃，难挡风吹雨打。再者，作为本应最具时代意识而锐利灼人的高校学生群体，整体性心志萎靡，蜷缩于商业压力与权力宰制的双重牢笼，所谓”后浪”者，不幸而为”社畜”也。同样本应直面人类苦难而抒写人性的作家们，面对时代，从诺奖得主至著名写手，连扯淡都谈不上，整体性沦落为”人格竖儒”。抑有甚者，甘为”咿咿呀呀”忸怩作态抬轿子吹鼓手也。那边厢，西方的左派正在重复上个世纪他们对于苏俄政权的错误认知，乔姆斯基老先生堪为昏聩典型，巴迪欧不甘瞠乎其后。至于那些吃了人家嘴软的，拿了人家手软的，更不论矣。凡此种种，东西连环，少长合璧，造成了

吾友所言”整体性文明可毁灭”之颓势矣。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存在

大疫起自武汉，迅速广布全球，至此，国朝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不无良善，卻因倡导者德位不侔，宣告破产，特朗普执政后重行大西洋孤立主义而拱手送上的重塑全球治理领导权机会，因此一疫，消耗殆尽，而国运亦可能随之逆转。连伊朗卫生部发言人，都忍不住以bitter joke 指斥国朝提供的疫情数据，说明国家公信坠底，政体德性破产，真可谓四面楚歌，山穷水尽。另一方面，美国在将近三十年里误判最大敌人，陷入耶回冲突而跋前踖后，同样耗尽冷战全胜之红利，却无视红色极权之羽翼渐丰，以至于养痍遗患，一如“二战”之与狼共舞，在灭掉德意志法西斯之际养大了更大的红色苏维埃恶魔，同样教训深重。事实

是，不折不扣是，為了打击绿教恐怖主義，而与红教邪魔结盟，結果养肥了一个更大的恶魔，可谓二十一世纪开局之初自由政体的最大教训。至于太平洋东西兩大国每日低水平口水战，昏话连篇，仿若童稚无赖小儿厮打，跌破底线，实在不堪，将这个时代文明低陋之本相，暴露无遗矣。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指谓普天之下皆兄弟、环球诸国诸族荣损一体之事实，借用为政治外交口号，亦且响亮，甚至兼具甚为厚重之道义。但因倡导者内政上恶待国民，此番大疫又造成全球停摆，致使这一作为政治外交口号之招贴，已然不攻自破，好端端一个理念就此同样停摆。后来虽然到处送钱送口罩，派遣数支医疗队，天天元首通话，却已然于事无补矣。旨在媚好的慷慨政治可能适得其反，枉费金钱人力。其间情形，恰如德媒BILD署名文章所言，”您是不是以为如果您现在在世界各地慷慨地发送口罩就是

一次伟大的‘友谊’？我不认为这是友谊，这是可笑的帝国主义行为。”事到如今，后冷战时代就此彻底结束，所谓的大国崛起及其”中美共治”型态告终，新一轮世界秩序重组恰与国朝早先希冀反向，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酝酿推进之中。而这既是极权政治逻辑的绝对主义普世理念诉诸实践后遭遇反弹的必然后果，也是自由国家社会推展的全球化之必然对冲要求。——世界变天，中国顿成孤家寡人，此前四十年辛劳几乎毁于一旦！北京奥运以还极权政体随着钱包鼓胀而不甘寂寞的一系列骚操作，七年来强人政治接续不断的前现代式愚钝妄为，其于国际政治层面太过幼稚的仿帝国式张狂，尤其是此次大疫初期之昏招迭出，终于事与愿违，借此世纪大疫，令吾国吾族吾民国际声誉跌至谷底，再度将中国推向危难边缘，而国族命运重遭生死存亡之抉择矣！

君不见，所谓”为世界人类指明发

展方向”云云，透露的是虚幻谵妄的领袖欲，正为毛式人格膨大之精神疾病阴魂与共产普世绝对主义两相激荡、互为底色之畸形发作，而以亿万国庆节衣缩食、凭靠公权无度财政汲取搜刮之财富，所推波助澜之公子哥癩病症候群也！至此，日本记者所讽之”无谬神话”，早已是自说自话了！

不宁唯是。海外华人，特别是对祖国怀有纯真眷念的留学生群体，其中又尤其是未成年孩子们，因为一纸禁令而回国无门，返家无航，不仅将个单相思击得粉碎，而且暴露了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刻薄寡恩，既悖人伦，亦违国法。旅俄同胞，数以万计，大难之际，辗转跋涉至东北口岸，希望返国避难，却被严堵于冰天雪地，更有那冷血大使厉声警告，”放弃入境幻想”。——全世界文明诸国，大疫爆发当口，悉数呼唤国民赶紧返国，游子归家，唯独国朝将同胞拒于国门之外，刻薄寡恩如此，令人情何以堪，暴露的却是视国民

如草芥之一贯心态也！他们可能遭遇驻在国民众的歧视甚或攻击，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多起这类事件，印证着笔者前文有关厌华排华的预计。而对于国民之吝啬，因有大额外援之比对，更加彰显，令人齿冷。湖北人均47元之救助，就矜夸慷慨，恰如网友慨言，不如民政部在青海三江源打个鸡蛋，然后说全国人民都喝到了鸡蛋汤算了。

走笔至此，或曰，瞧瞧美英，防疫不力，不如咱呢，你为何不鸣鼓抨击？朋友，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我更关心自家同胞，不行吗！？

总之，如此这般，不讲价值标准，只关注产业链的这波浪漫全球化，至此终结。新一轮政治与文明的全球性分化组合，伴随着疫情发展，悄然拉开了序幕。其间，全球性的去中国化进程已然启程，正在展开，从金融、产业布局到资源配置，一场去中国化的新秩序必随后疫情时代之政治反思而加速推进。此不幸也，而祸肇于庙堂，苦难

却为全民所承受矣！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世界体系的广泛参与者，遭逢如此逆转，怨不得别人。其结果就是，在最好的意义上，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纵使中国）战略机遇期虽未过去，但已进入危中求机阶段，国际上去中国化使形势极其复杂和不利，连非洲等基本盘都出现松动，前期大量投入可能失效。”

尚需指出的是，俄罗斯一直利用疫情与美帝眉来眼去，火中取栗，渔翁得利，直至俄美发表联合宣言，大赞”易北河精神”，旨在”共同应对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挑战”，则挑战何在、挑战者何，实在意味深长，用心与理念均不加遮掩。置此世界体系自助体，俄人所作所为旨在扩大自家利益边界，无可厚非。遭到羞辱，哑巴吃黄连的是战狼式外交的主导者，而将吾国吾民置于险境。将涉关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非西边一家之责，但却更为吃亏且危乎殆哉。正是在此，

再说一句，几年来封建土围子式外交及其逞口舌之快的小心机，害莫大焉，赶紧休矣！

在此，尤须着重指出，凡我国民，必须阻止狗急跳墙式转移视线的任何战争冲动，无论它来自何方。疫情档口，未必开火，而大疫后果，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文明敌意之第次凸显，往往后延半年一载，甚至三年五载，则其时危险系数反而升高，有意为之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更大。1929年以还之世界经济危机，终究催导出1939年之“二战”恶果，殷鉴不远矣。在此，国朝无需汲汲于跟美帝争锋式的军备比家伙，更不能动不动对祖国宝岛同胞们示狠，老美也别老在中国边上耀武扬威炫肌肉。就吾国情形而言，建设常态国家与文明国家，而首先是让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免于恐惧，比什么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

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正在修正着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雅尔塔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将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吾国华夏文明无冤无仇也。毕竟，十九世纪那种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征服式景象，洋大人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返矣。而且，究其实，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共产极权”是入侵者的蛮族征服，吾国不幸而成其殖民地矣。在此，有一种讲法叫做“意识形态偏见”，佯论者大言滔滔，指斥外人对于国朝抱持“意识形态偏见”看似振振有辞，实则根本无理，纯然混淆是非。须知，类似于文化多元或者价值多元，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不等于抽空基于人类良知的正邪判断，更不能以所谓意识形态差别取代正邪判断，而与邪恶为伍，

为邪恶张本。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旦与权力互为表里，就脱离书斋，展现其现实性，载浮载沉，为祸为福，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人类良知的检视和判别。当今世界，历经苦难，饱尝忧患，早已晓谕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立宪民主与极权专制之异于人禽，不可两立；良政善治与统治治理分处不同层面，岂容混淆。时至今日，没人会说对于作为纳粹精神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支撑现代殖民势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于奴役戕害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对于贬抑女性的男权至上主义——总之，对于凡此种意识形态之抵抗与排拒，竟然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此为底线，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做祈福人牲之邪教，否则便是打开地狱之门。

是的，其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是指对于国朝建制立政的那种“主义”之拒斥。而它不是别的，就是笔者多所陈

述之邪恶的”法日斯主义”。此种意识形态，将法家愚弱人民的残苛法术、日耳曼马恩之狂悖历史社会理念和斯拉夫列宁斯大林之暴虐专政学说，杂糅混融，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宰制当下的人世生活，而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一历史规律者；煽动和利用人性之恶，凭借霸道垄断一切权力与财富，将党国独大及其万世一系凌驾于国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称国家人民是自己的”家业”，而将邦国及其人民视同予取予夺的殖民地；特别是它摧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要求一统与服从，践踏美感和人伦，崇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视常识，早已令吾土陷入血海，天下颤栗。当其狂暴发作之时，多少同胞尸横沟壑，多少灿烂文明善果惨遭毁灭。痛定思痛，对于此种”法日斯主义”之厌恶、排拒与痛恨，绝非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毋宁，乃是常态人类社会正邪不两立之同仇敌忾。时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笼罩下，一个令自己的人民恐惧，也让世界不安的政权，其言行不一，恶待

国民，政策飘忽而不可预测。在此设问，于此怵惕，为人世生活布防，唯恐其少与缓，不惮其繁与速也。君不见，自由政体世界居安一隅，承平既久，了无斗志，大哥二哥麻子哥，致使”法日斯主义”坐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终于招致大祸矣！

当下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进程走到了最后关口，几经跌宕，就差最后临门一脚。将转未转之际，”法日斯主义”借助体制暴力，返身回头，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国超过七代人的长程接续浴血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故而，急切呼唤基于人性、呵护人生、尊重常识，而立基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国家理性，时不我待矣。在此，尊重常识与人性，容忍独立多元，鼓励自由探讨，兴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护”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均为其目。从反面而言，则拒斥党国体制、权力垄断与领袖神话，取消书报检查与思想操控，同为其目。”

纲举目张，则”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依法”，凡此政道与治道，蔚为其纲矣。

顺说一句，值此档口，放眼世界体系，基辛格这类跳梁小丑式掮客术势之徒，已无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头了。保尔森式赚得盆满钵满的骗子，肯定也是见好就收，不敢再趟浑水。瑞幸之厄，自作孽不可饶，但实为金融绞杀之预演，牛刀小拭，兵不血刃，遭殃的是万千平民，而非国朝权贵与布局套现的巨骗大鳄。笔者申说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主义第五场战役，在边缘抗争燃烧烽火后，居然是以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瘟疫而全面铺展开来，正所谓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纵使诡诈，千般机心，奈不过天行有常也！恰如网议所言，从世界大国蜕变为全球公敌，将此凸显的转折点竟然是一场撒播全球的疫病，虽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其病在腠理，非疥癣之疾，却为肘腋之患，无它，即此”

法日斯主义”也！要是对此邪恶之教义进行抵抗与批判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如同对于劫匪之谴责就是”道德偏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是一种可问责性公民之道，人民为大，派生出有谬与纠谬、认错与道歉的政治文化。否则，便是恶政，国将不国。秉此以思，为防悲剧重演，则下述八端，允为起点。

第一，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数据，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为此，需以“国务院白皮书”形式，载明其间央地政府所作所为，尤其是今年一月三号与一月七号两个时间节点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说明为何及时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却对全体国民隐瞒撒谎，致令百姓毫无防范，死伤惨重。

第二，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义士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在武汉择地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卒年月，寄托哀思，永铭教训。

第五，在武汉择地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张公民气节，褒扬公义精神。

第六，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属抚恤基金（不包括删帖累死的网警）。

第七，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网警恶政，严禁网信办侵犯公民隐私、言论自由等根本违宪之专断擅权，取缔警力动辄训诫教师、医生和作家等专业人士的思想警察权力，即刻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撤销一切学术、教育机构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党团组织，立刻停止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强拆之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落实宪法对于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将地权归还人民，剥夺政府之为最大的垄断地主的合法性。

进而言之，细节而论，将毛某独占之纪念堂改建为”华夏先贤祠”，列展我华夏文明先贤志士；天安门广场每逢周末开放为 sunday market，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中南海回归文物公园位置，不再为私宅与党派之用。循此往前，进境于开放报禁党禁，乃至于一人一张选票，每隔三五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挑挑拣拣，为这个大型国族甄选尽心适格的物业管理公司！总之，启动政改进程，明确宣示政改时间表，

逐步抵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时不我待矣。

顺提一句，时至今日，所谓民众未开，因而宪政难行、民主必乱之论，纯为不明所以之论，抑或，恐吓大众之论也。历史进程从来有赖于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精英义士之前赴后继，示范推导。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维新与辛亥年间识字国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难理解历史从来都是精英创造推动的。故而，当下中国，以围绕着包括上述八点建议在内的具体事件而展开公民运动，点点滴滴，撬动僵化政治秩序，推导社会进步与政治改良，此其时矣，其必弘也。



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辩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

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否则，昨日的罪恶及其苦难不仅并没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个作恶的体制依旧，而且，但凡稍一松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凡此种种，苦难深重，眼面前的事儿，岂是轻轻一句”翻篇了”所能打发！朋友，凡我同胞，不愿就是头念那样赧赧苟活的日子，为人为己，就当奋然抗争，再不能容忍极权政制继续施虐矣！

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骛骛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

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庚子春末夏初，忿然、忧然而怆然矣

践踏斯文 必驱致一邪魅人间

继“驱低”恶行之后，两年来帝都羸政持续癫狂，尤以庚子春夏发作之格外歇斯底里。到处强拆，雅曰增加土地储备，而实则指向土地增值，再于上下其手中倒腾牟利。“一房东”、“二房东”，权钱之间，勾肩搭背，环环相扣，盆满钵满，苦的是万千住户。其间，既有历经数年辛苦经营的艺术区画家村惨遭涂炭，亦有小民血汗赁建之住宅区无端遭殃，还有无数提供就业饭碗的小微企业借壳经营之废旧老厂区灰飞烟灭。君不见，包括著名画家尚扬先生的工作室、著名诗人俞心樵的创作室、著名音乐人秦万民的录音棚，涉及环铁艺术区、00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水坡艺术区、黑桥艺术区、酒厂艺术区和罗马湖国际艺术区，以及崔村与流村住宅区的大片房产，均于此波强拆中荡然无存，堪为浩劫。

凡此住宅小区和艺术区，并非违建，多数货居亦未逾期，当然更无碍“首都风貌”。相反，几代艺术家的血汗投入与惨淡经营，让荒僻村庄濡染斯文，令破败山水踵事增华。只要出城十余公里，不同于长安街的烨烨光鲜，迥异乎中南海里之水光山色，尘埃中的北国乡村多数荒凉，有的夏秋林木葱茏时远观还堪人居，冬春荒芜时节则一律垃圾遍地，破败隳颓，具象展现着这个繁华盛世巨大时代落差之“时间的丛集”。艺术家们的进驻，筚路蓝缕，雄风豪雨，不仅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当地三产，而且极大提升人文生态。村民欢迎，居者怡然，相得益彰也。若无他们点缀其间，如传教士般耕耘，这荒凉山庄，恰如栗宪庭先生所言，“鸟不拉屎”嘛！故而，其行其止，适为公权当为而无所为，才是民力所向而为民所用，恰值感念、保护与褒扬也。现如今，利斧之下，铁铲尽头，居屋不存，斯文荡然，真所谓暴殄天物、丧心病狂矣！

时至今日，北京之为北京，并非只在官衙林立、乌纱云集，更在于文人雅集、学府森然、艺苑琳琅，它们拼组成这个国家的名片，他们释放出久遭压抑的神州文华，这才多少有些模样儿，甚至于造就出些许儿气象呢。而且，凡此水寒烟淡，文火慢炖，需要经年养育，数代人的泣血栽培，外加天时地利，方始有望聚拢人气，而渐成气象。工程师可以批量培养，法学家也可自课堂走出，唯独艺术家，如同诗人和数学家，必禀才情天赋，荷动香浓，方始有成。而才情天赋托付于时代造化，仰赖于地利天时，可遇不可求也。如此风生水起，雷电激荡，才俊出矣，气象兴矣。故而，艺术家是人性之祭司，文明之托命者，国族之无上瑰宝。但凡为政不傻不坏，都懂得必须倍加爱惜，尤需万般珍重。没有艺术的润泽，水遮山隔，暮烟长啸，人性便如沉沦于海底般幽冥；缺了伟大艺术家的时代，风云断续，吴霜暗侵，人世不过是晦暗的众冥公社。相反，必为昌达人间，光华人世，

也才有惬意人生。伟大的艺术造就辉煌的文明，文明昌盛必表现为艺术之巍峨灿烂。它们相濡以沫，交相辉映，这存在方始具有存在性，这人间也才可能禀赋人间性，而人啊人……就此获得了人性，从而，大千美轮美奂，适堪我们芸芸宜居矣！

正是在此，1970年代末起步的“第三波改革开放”以还，几代人将近半个世纪的辛苦积攒，将打断的文脉接续于生灭之际，让早已湮灭的斯文薪火余烬复燃，吾国吾族这才有了生机生气，也好像渐有些儿文明气象，这中间就少不了艺术家们的辛劳身影。否则，这帝都不就是个公章仓库、权杖大食堂和熙来攘去的官吏宿舍吗！仅仅六年前，笔者还曾喟言，照此开放势头，老迈京城有望成为一十一世纪的维也纳，二十世纪之伦敦、纽约、波士顿，我华夏文明也有个光照环宇、熠熠生辉之时呀。可惜话音未落，羸政猖獗，批老师，赶画家，扒墙揭瓦，其熠熠云乎

哉？还光照个鬼哟！

本来，大疫尚未过去，半个中国又泡在水中。灾祸连连，生民无辜，而民生艰困，伴随着全球性凋敝与失业大潮拍岸而来之诸种次生灾难，包括经济、伦理与政治之方方面面，正在并将递次显现，甚于一场大战。当此之际，民意求安，民心思治，正需公权实施惠民政策，表达生民伦理，展现政治善意。换言之，纵不欲减税让利、开仓赈济，也至少与民休息、宽和简政，而非乘隙搅扰，甚至火中取栗也。睹此情形，善良的心肠不禁要问，此方公权一心一意与生计作对，不惜悍然践踏斯文，其所为何来？其欲将何往？他们究竟抽的是什么疯？

朋友，国朝体制，党国乃举世之第一大地主也。亿万生民世代栖息于兹，没想到而今却被褫夺了自然地权，也是天赋的法权。那边厢，巨无霸只手垄断大地，全体国民皆为流浪者也。置此情境，我们栖息于大地，自盘古开辟地

就栖息于大地，踉跄至今，竟无安居之日矣。或曰，“中性政府”，其自身并无私利，所作所为图的是公利公益。可惜，面对强拆，那强拆后上市的天价地皮，就已将这乌托邦修辞拆穿殆尽，夫复何言。再者，垄断思想、斫丧精神的政体，绝不容忍任何独立于“规划”之外自发生长的艺术和思想生态，必欲扼杀而后快，展现的是强求一律齐整的法西斯美学恶趣。是的，面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他们掩饰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而强拆执行人员的暴蛮所展现的盗贼逻辑和暴力形态，适为一种“古拉格逻辑”。煌煌公权，居然雇佣流氓打手般嚣嚷徒众暴力执法，状如黑社会，表明其间的生存法则，内在一脉贯通，真正大哥二哥麻子哥也。

京城强拆、“驱低”之丧心病狂，赣鲁铲坟焚棺、“合村并居”之伤天害理，凡此表象殊异，而理则如一，均为强盗逻辑，作死的节奏，不仅违犯实在之法，更且悖逆普世公理。有意思的是，

公权悍然强拆之时，也正是千呼万唤之《民法典》颁行之际，而民法的精神在于保护私产、捍卫契约神圣、坚守主体平等与意思自治。上揭公权暴政，恰与此背道而驰，则何其反讽也哉，而再次说明，在在说明，置此国朝，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法治必随也只能紧随民主之立而后立矣。面对恶政，国朝民法学者普遍胆怯畏葸、势利猥琐却又装模作样，为此乖张提供了又一小注。

行文之际，强拆铲车还在轰隆，瘟疫继续蔓延，南国洪水滔滔。俯瞰寰球，国朝四面楚歌，内忧外困，棋已下成了死局矣。而官媒无耻选择性失明，依旧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不过奏响了一曲末世哀歌而已。再说一句，嬴政疯狂，糟践生计，践踏斯文，必驱致一邪魅人间，吾人岂能等闲视之？

2020年6月25日庚子端午于故河道旁

出版社的话

山巅出版社成立于2020年4月，致力于移动设备电子书的创意、编辑和出版工作。出版社主要结集出版已在网络全文发布的公益图书。图书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购买原版支持作者。本社出版之公益图书及制作使用之素材和源代码均可从以下电报频道免费获取：

<https://t.me/s/shandian2084>

投稿邮箱：

shandian2084@gmail.com

参考资料

- 许章润文章存档，中国数字时代

版本历史

- v20200713 第一版 [A&R、David、小雷、wanggonging]